

分类号:

UDC:

学号: 405001405227

南昌大学 硕士 研究生
学位论文

宋代江西佛教与社会

Buddhism and Society in Jiangxi of Song Dynasty

巩丽君

培养单位(院、系): 人文学院历史系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宋三平教授

申请学位的学科门类: 历史学

学科专业名称: 中国古代史

论文答辩日期: 2007年 月 日

答辩委员会主席: 方志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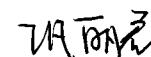
评阅人: 宋三平

彭明翰

2007年 月 日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获得南昌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手写）： 签字日期：2007年12月28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南昌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南昌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同时授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将本学位论文收录到《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并通过网络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保密的学位论文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签字日期：2007年12月28日

签字日期：2007年12月28日

摘要

宋朝统治者在立国之初，就对佛教采取了复兴与保护的政策。江西境内，佛教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继续繁荣。禅宗兴盛，高僧辈出，佛寺分布广泛，佛教文化繁荣是宋代江西佛教发展的主要表现。宋代江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佛教的发展也影响了江西地方的文化教育事业、公益事业及民间习俗。

本文研究宋代江西佛教与社会，关注佛教与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考察宋代江西佛教的发展概况和特点，从佛教与社会的互动中，探究佛教在江西弘扬传布的原因，从而进一步分析江西地区的佛教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及社会各阶层的佛教信仰活动，对佛教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乃至其间的整合程度，有更加清楚的认识。

关键词：宋代；江西；佛教；社会

ABSTRACT

The Song Dynasty had adopted policy to revive and protect Buddhism at the nation's beginning. In Jiangxi, Buddhism continued to flourish at the foundation of the front generation's development. The prosperity of zen , coming forth in large numbers of hierarch, wide distribution of Buddhist temple, prosperity of Buddhism culture were the main performance of Jiangxi Buddhism development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Jiangxi's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in Song Dynasty promoted Buddhism's development. And Buddhism's development had also affected Jiangxi's culture, education, the public utility and the folk custom.

This article mainly reasearch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ddhism and Society in JiangXi of Song Dynasty ,pay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ddhism and politics,economy,culture, inspects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Jiangxi's Buddhism in Song Dynasty.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reason which Buddhism propagates widely in Jiangxi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Buddhism and the society, thus go further to analyze the social function of Jiangxi's Buddhism in Song Dynasty, and the belief activities of Buddhism in all society .So to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Buddhism and politics, society, economics, idea and culture ,and even about their conformity degree.

Key words: Song Dynasty, Buddhism, Society, Jiangxi

目录

第1章 引言	1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1
1.2 学术史回顾	2
第2章 宋代以前江西佛教发展概况	8
2.1 东汉至三国	8
2.2 两晋至南朝	9
2.3 隋唐时期	11
第3章 宋代江西佛教	13
3.1 宋代佛教发展概况	13
3.2 宋代江西佛教的特色	14
3.2.1 禅宗兴盛 高僧辈出	15
3.2.2 佛寺林立 分布广泛	16
3.2.3 佛教文化 繁荣昌盛	18
3.3 宋代江西佛教繁荣的原因	20
3.3.1 政治：宋帝的崇佛政策及地方官吏的护持	20
3.3.2 经济：发达的江西地方经济	24
3.3.3 文化：好巫尚鬼的地域文化	26
第4章 宋代江西佛教与社会	28
4.1 佛教与江西地方文化教育事业	28
4.1.1 佛教与江西诗派	28
4.1.2 佛教与理学	30
4.1.3 佛教与书院教育	31
4.2 佛教与地方公益事业	33
4.2.1 兴修桥梁	34
4.2.2 兴修水利	35

目录

4.2.3 植树造林.....	35
4.2.4 赈济医疗.....	36
4.3 佛教与江西地方民俗.....	37
4.3.1 信佛奉佛.....	37
4.3.2 停柩于寺.....	38
4.3.3 丧葬习俗.....	39
4.3.4 节日习俗.....	40
第5章 结语.....	41
致谢	42
参考文献.....	43
附录A 禅宗五家七宗表.....	46
附录B 宋代江西佛寺兴建表.....	47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51

第1章 引言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佛教于两汉之际自印度传入中国，历经魏晋南北朝的传播、发展与演化，至隋唐时期达到了鼎盛。至宋代，佛教更加世俗化、大众化，信仰的阶层和范围更加的广泛和深入。据《宋会要辑稿·道释》记载，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僧众397615人，尼61240人，寺院4万余所，达到了宋代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佛教在宋代社会发挥着社会教化与调控功能，对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产生了诸多影响，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从东汉末年，佛教传入江西，江西多次成为佛教弘传的要地。东晋太元年间（376—396年）慧远在庐山创建东林寺，倡导弥陀净土信仰，从而开创了净土宗。唐代中期，禅宗自六祖惠能后，衍出南岳怀让系与青原行思系，青原系由行思（？—741年）开宗立派于吉州青原山（今江西吉安）。唐末五代，南岳系又分化为沩仰、临济二宗，沩仰宗由潭州沩山（今湖南长沙）灵祐（771—853年）与袁州仰山（今江西宜春）慧寂（807—883年）正式所创。青原系又分化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曹洞宗为筠州洞山（今江西宜丰）良价（807—869年）与抚州曹山（今江西宜黄）本寂（840—901年）所创，合称为五宗。宋代江西佛教宗派林立，高僧大德辈出，尤以禅宗与净土宗最为兴盛。仁宗年间（1023—1063年），临济宗又分化为黄龙、杨岐两派。黄龙派为隆兴府黄龙山（今江西南昌）慧南（1002—1069年）所创，杨岐派为袁州杨岐山（今江西萍乡）方会（992—1049年）所创，兴盛于江西境内，亦称宗，传播至新罗、日本等国。至此，禅宗呈现出“五家七宗”的盛况。禅宗诸宗大多直接或间接开宗立派于江西本土，弘扬佛法于江西全境。此外，律宗、贤者诸宗在江西境内仍有传承。江西境内，诸宗竞秀，宗匠崛起，兴建佛寺之风盛行。据笔者根据清光绪《江西通志》统计，宋代江西佛寺之新建达161所，江西境内佛寺有名可考者达1178所。据《宋会要辑稿》等史料统计，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左右，江西僧尼约为36000余人。江西佛教极盛一时。

纵观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其发展需要朝廷官府的认可，当地士绅民众的资助，

经济资源的供应，才能有所成就。佛教亦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层面，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此为出发点，笔者拟以宋代江西佛教为研究对象，考察宋代江西佛教的发展概况和特点，从佛教与社会的互动中探究佛教在江西弘扬传布的原因，分析江西地区的佛教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及社会各阶层的佛教信仰活动，希望对佛教与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更加清楚的认识。通过把江西作为一个研究单位，得出一般性的结论。

以往学者们对佛教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侧重于对佛教教理的探讨、佛教史的撰写、佛教典籍的整理，在研究观念上重整体性的研究与论述，轻地域性调查与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重宏观研究，忽视微观研究，如对佛教人物、事件、制度、信仰、寺院等的具体研究都显得不够充分。笔者以宋代江西佛教与社会作为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课题，以期在研究内容、地域范围及方法上的有所创新。在研究内容上，将佛教研究的视角转向社会，把政治、经济、地理文化环境、社会影响等问题有机的融合在一起。研究佛教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无论是对于研究宋代社会与历史，还是研究宋代佛教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研究地域范围上，学者以往多关注福建、两浙地区，对江西地区关注不够，本文侧重探讨宋代江西地区佛教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将拓宽宋代佛教与社会研究的地域范围。在研究方法上，运用区域社会史的理论方法，由地方来辐射全国，由特殊到一般，实现理论方法上的创新。所以，本文欲深化对佛教传播的社会因素、佛教团体与社会诸层面的有机融合等问题的研究，从而有助于加深对佛教与社会这一课题的研究。最后，党和人民政府正在积极构建“和谐社会”，研究佛教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有助于促进这一理念的早日实现。

1.2 学术史回顾

宋代佛教研究：国内第一部佛教史是20世纪初蒋维乔撰写的《中国佛教史》，书中第十六章“宋以后的佛教”，简要叙述了宋代的佛教概况。20世纪下半叶，佛教史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研究者从文化、社会、历史等多视角开展佛教研究，成果亦较以前丰富，相关的断代史、地方佛教史相继问世。20世纪80年代以来，郭朋的《宋元佛教》^①，顾吉辰的《宋代佛教史稿》^②，美国学者

^①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黄启江的《北宋佛教史稿》^①，均是对宋代佛教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著作，这些论著资料翔实，分析缜密，多富创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此外，日本学者的中国佛教史研究也成果累累。高雄义坚博士收集有关宋代佛教论考而成《宋代佛教史研究》^②，竺沙雅章教授著有《中国佛教社会史》^③，都对宋代佛教社会做了深入的研究。

禅宗研究：在佛教宗派研究方面，最为人们关注，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是禅宗研究。在佛教诸多宗派中，禅宗被认为是中国化佛教的典型，因而禅宗研究具有特殊意义。禅宗兴盛于江西全境内，其影响是全局性的、历史性的。江西是禅宗的主要发源地，其五家七宗有两家三宗起源于江西，对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阐述禅宗的著作众多，重要的有顾康伟的《禅宗：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④、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⑤。《中国禅宗通史》系统叙述了禅宗从形成到清初“终结”的历史。魏道儒还著有《宋代禅宗文化》^⑥。台湾学者褚柏思著有《中国禅学史话》^⑦。郭朋在其著作《宋元明清佛教思想》^⑧一书中，对黄龙、杨岐宗做了系统的介绍。高雄义坚博士在其《宋代佛教史研究》中作了“宋代禅宗的性格的研究”。除以上一系列专著外，还有诸多论文探讨了禅宗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王琦珍的《禅宗与宋代江西作家》^⑨，阐述了禅宗对江西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赵庆麟在《禅宗与宋代审美取向》^⑩中指出宋代文人在与禅师交往中，接受了禅理和风格，具体表现为清静幽远、澹泊无为、自然平易、妙语神会。刘松来在《诗风慕禅 江西宋代诗歌繁荣的禅学因缘》^⑪一文中，认为禅宗对江西宋诗的影响大致表现在三个层面：闲适淡泊的超然心态、平淡简放的艺术风格、审美意象哲理化。钱建状与美国学者伊罗兰合著的《南渡士人的佛教因缘与文学创作》^⑫认为真正将参禅和做诗结合起来的是南渡诗人，并且就时间来说，禅诗相通，至南渡后，方为诗人的共识，这是最值得注

^① 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4月版

^② 台北：1987年华宇版

^③ 京都：同朋舍，1982年版

^④ 上海知识出版社，1990年6月版

^⑤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⑥ 郑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⑦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年版

^⑧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⑨ 江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⑩ 开封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⑪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⑫ 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意的现象。熊江梅、张璞在《试论佛禅思想对宋代文化整和会通的影响》^①中，阐述了黄庭坚及他所领导的江西诗派大都耽于禅悦，因而对于佛禅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平等思想有充分的认识，对“理一分殊”的哲学思想体会深刻，这使他们看待文学艺术具有深刻的眼光。韩毅在论文《宋初僧人对儒家中庸思想的认识与回应》^②中，以宋初名僧释智圆与释契嵩为主，探讨了宋学形成前僧人群体对儒家中庸思想的认识与回应，这种认识与回应也为宋代学术界提出了重建社会秩序与思想秩序的一种策略。

宋代佛教寺院经济研究：20世纪30年代，何兹全先生先后发表《中古时代之佛教寺院》^③、《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④，这是较早研究中国佛教寺院经济的论文。80年代以来，研究佛教寺院经济的学者和论著增多，著名的有游彪、黄敏枝等。游彪著有《宋代寺院经济史稿》^⑤一书，对寺院的僧官制度与寺院的组织管理，从寺院的组织层级到僧侣间的等级、寺院经济活动中所反映的阶级关系、寺院经济的地域分布到寺院经济空间贫富的差距等问题展开研究，不仅深入论述了寺院经济本身的重大问题，同时也将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与寺院经济制度的关系、朝廷的行政管理与寺院经济发展的关系、僧侣个体与僧院的关系、寺院与社会的关系等纳入研究的视野，其系统性与完备性在同类研究中堪称第一部。台湾学者黄敏枝著有《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⑥，此书对宋代佛教寺院经济论述比较广泛，部分论证又极为深入。两位学者亦著有相关论文。黄敏枝的《宋代寺院经济的研究》^⑦一文，探讨了寺院庄园的成立、寺院以何种方式来获取庄园、寺院与佃客的关系、功德坟寺的产生、福建与两浙的寺院与社会、寺院对于工业与商业的运营等问题，认为宋代寺院得以在经济和社会两方面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角色，不得不归因于宋代寺院经济的发展。他还著有《宋代寺观与庄园之研究》^⑧、《宋代寺院的工商业经营》^⑨等多篇论文。游彪在《论宋代寺院经济的地域差异》^⑩一文中，认为从局布范围来看，两宋时期

^①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② 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3期

^③ 中国经济月刊，1934年第2卷第9期

^④ 食货半月刊，1936年1月第3卷第4期

^⑤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⑥ 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

^⑦ 1978年度博士学位论文

^⑧ 大陆杂志，1973年4月46卷4期

^⑨ 成大历史学报，1976年7月3期，

^⑩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

无论从各路僧尼人数的多寡、寺院的分布，还是就寺院经济力量的强弱而言，各地寺院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十分突出，并分析了造成这种不平衡性的原因。薛志清的《宋代僧尼经商小议》^①，认为僧尼的经商活动有逐利的一方面，但同时也促进了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寺院既是宗教组织，又是经济、社会组织。僧尼的经商活动往往与福利或慈善事业相关。商业活动与宗教活动、慈善事业相渗透是寺院僧尼经商的一大特点。关于宋代寺院经济的相关论文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再赘言。

宋代佛教与社会研究：有关佛教与社会的论著，早在1939年法藏馆出版了日本学者道端良秀以教团史、文化史为中心的《中国佛教史》，作者自叙此书重点在放在“佛教教团的社会史、社会经济史、法制史”等方面，主要叙述佛教与一般大众的关系，不同于以教理史为中心的中国佛教史。他在《中国佛教与社会福利事业》一文中，专门论述了佛教慈悲心、布施心和福田思想对士庶民众的影响及僧人在社会福利事业中做出的贡献。此外，竺沙雅章博士的《中国佛教社会史》一书，亦涉及佛教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台湾与大陆学者在宋代佛教与社会研究方面成果颇为显著，对本文的写作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路与参考。台湾学者方豪在《宋代佛教对社会文化之贡献》^②中论述了佛教团体的慈善活动。其相关的论文还有《宋代僧侣对手栽茶之贡献》^③、《宋代僧徒对造桥的贡献》^④、《宋代佛教对旅游之贡献》^⑤、《宋代佛教建筑举隅》^⑥等。台湾学者黄枝繁在《宋代佛教寺院与地方公益事业》^⑦中，列举了宋代僧人在土木经济事业如桥梁、道路、水利的兴建与维修、僧寺对旅游者提供宿食，社会救济事业如养老、济贫、赈饥、慈幼、医疗方面，慈善事业如漏泽园、义冢、浴室等方面所做的贡献，由此可看出宋代佛教教团在地方公众事业中的努力和贡献。宋三平的《宋代的坟庵与封建家族》^⑧指出坟庵是宋代封建家族整合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宋以后封建家族组织形成的重要一环。白文固的《宋代的功德寺与坟寺》^⑨认为寺院依托权贵阶级，乃有功德坟寺的产生。这两篇论文均体现了寺院与社会

^① 邢台师范高专学报，1997年第3期

^② 现代学苑，1967年6卷9—11期

^③ 大陆杂志，1964年第4期

^④ 东方杂志，1969年复3卷4期

^⑤ 东方杂志，1971年复5卷3期

^⑥ 现代学苑，1971年8卷9期

^⑦ 收录于《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礼俗与宗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4月版

^⑧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⑨ 青海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的密切关系。谭凤娥的《宋代的社会救济事业评述》^①、郭文佳的《宋代的济贫与助困》^②、吴业国的《宋代官办慈善事业论述》^③均提到僧人为宋代慈善机构的主要日常管理者，如福田院、漏泽院、居养院、安济坊、养济院都是以“僧管勾”或“僧主之”。这些论著与论文都为研究佛教与社会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宋代江西佛教与社会研究： 宋代江西佛教与社会的研究还较薄弱，可见的专著有韩溥先生所著的《江西佛教史》^④。《江西佛教史》阐述了佛教传入江西到现代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各个宗派的产生和发展，第三章第四节叙述了宋代江西佛教的鼎盛情况及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另外，许怀林在《江西史稿》^⑤第九章“宋代江西社会与文化”中论述了佛教和道教的传播。二者侧重于对佛教宗派、禅师名僧的叙述，对佛教植根于社会的原因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未能做进一步的研究。而在其他的一些论文中我们亦可窥见宋代江西佛教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相关论文有：许怀林的《十世纪前佛教在江西的传播》^⑥，就五代以前佛教在江西传播的情况，它与其他社会条件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描述了一个大概轮廓。认为江西境内，不仅寺院众多，而且有不少海内名刹、高僧，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童辰的《江西古代佛教文化概说》^⑦，称佛教各宗中影响最大的净土宗，即东晋高僧慧远在庐山所创；典型的中国佛教——禅宗，与江西亦颇有渊源，禅宗五家七派中，仅在江西开宗的就有沩仰、曹洞、杨岐、黄龙等宗派。吕凤裳在《宋代民间的佛教信仰》^⑧一文中，重点论述了宋代的民间佛教信仰主要表现在人们的庙神膜拜上，人们纷纷以烧香拜佛、布施斋僧、修建佛寺、刻印佛经、放生吃素、念经拜佛等方式来表达对佛教或菩萨的景仰与崇拜。文中大量引用了《夷坚志》的原始资料，有相当多是关于宋代江西民间佛教信仰的记载。周榆华在《《夷坚志》反映的江西民俗》^⑨一文中论述了江西民众信奉佛教的民俗，如虔诚信佛、在家诵经敬观音、寄柩于寺等，

^①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7期

^② 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③ 南都学坛，2005年第1期

^④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

^⑤ 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1月第2版

^⑥ 江西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

^⑦ 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⑧ 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

^⑨ 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反映了佛教对民俗的影响。朱瑞熙的《宋代的丧葬礼俗》^①、张宏惠的《宋代火葬考论》^②，均提到宋代火葬的盛行与佛教的传播有关。在佛教盛行的地方火葬墓发现也较多，其中有福建、两浙、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此外还可参考江西学者的研究成果，如何明栋的《佛教对我国古代书院的影响》^③、焦克明的《陆九渊与禅学》^④、童辰的《理学与中国佛教》^⑤。以上参考文献对本文的写作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借鉴。

综上所述，前人对于宋代佛教的研究成果颇为显著，这是本文写作的前提与基础，同时为本文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及重要思路。宋代江西佛教与社会的系统研究还很薄弱，其材料散见于各种史料中，需要细致的收集与整理。本课题希望加深对宋代江西佛教与社会的进一步探讨，亦希望对当今江西社会的发展有某些借鉴意义。

^① 学术月刊，1997年第2期

^② 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③ 朱子学刊，1992年总第4期

^④ 争鸣，1989年第2期

^⑤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第2章 宋代以前江西佛教发展概况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江西，至宋代，在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在江西这块“人杰地灵”的土地上扎根、传播、演变。宗派繁衍，高僧璀璨，共创了江西佛教的繁盛。宋代以前的江西佛教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东汉至三国、两晋至南朝、隋唐三个历史阶段。

2.1 东汉至三国

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学术界通常认为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肇建洛阳白马寺。此后不久，佛教即开始向江西传播。据清光绪《江西通志》记载，彭泽县安禅寺，“僧祖印创”，创于“汉永平间”（58—75年）。浮梁县双峰寺，“僧如志修”，建于“汉元嘉元年”（151年）。但学者们对这两处建寺时间存在疑问，未有充分的史料证明南北近乎同时建立佛寺的可能性。而据现存史料考证，学者们多认为佛教传入江西，至迟为东汉末年，始于东汉安世高。梁释慧皎《高僧传》记载“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正后之太子也”，“王薨，便辞大位。深惟若空，厌离形器，行服既毕，遂让国与叔，出家修道。……以汉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机敏，一闻能达，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于是宣译众经，改胡为汉，出安般守意，阴持入大小，十二门及百六十品”，“高游化中国，宣经事毕，值灵帝之末，关雒（关中洛阳）扰乱，乃振锡江南。云：‘我当过庐山度昔同学。’”“便达豫章，即以庙物，为造东寺”。^①这段文字描述了安世高让位于叔出家修行，于东汉桓帝初至灵帝建宁中（147—172年）在洛阳等地译经讲经，弘扬佛法，随后游历豫章、浔阳、会稽等地。他在豫章所建东寺又名大安寺，“大安寺在省城北，初名东寺，西域僧安世高本安息国王子，避位来此，遂名大安寺。”^②任继愈的《中国佛教史》说：“灵帝末年，关河扰乱，安世高避难江南，经庐山、南昌至广州，死于会稽。他行走的这条路线，大体反映着当时佛教传播的路线”。^③傅教石的《西域佛教与江南佛教》认为“江南地区佛教的流传，是从安世高、支谦等人开

^① (梁)释慧皎《高僧传》卷1《汉雒阳安清》

^②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121《寺观》

^③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85年第1版

始的”。^①韩溥在《江西佛教史》中指出：“目前尚未发现江南有比此更早的佛寺时，姑且以豫章东寺为江南初寺，以安世高为江西和江南佛教之初祖。”^②继东汉安世高后，西域僧人与中国僧人渐渐来赣弘传佛法，建寺建塔。据清光绪《江西通志》载，东吴赤乌间（238—250年）建立的寺院有庐陵的南塔寺、崇恩寺，泰和的崇福寺、永新的松林寺、信丰的延福寺。东吴建兴二年（253年），庐陵东山禅寺建立，宝鼎年间（266—269年）创建分宜福胜寺。从东汉中平年间（184—189年）到三国吴宝鼎年间（266—269年）的80多年中，在江西庐陵、湖口、奉新、崇仁、永新、新丰、南康、分宜等地陆续兴建了佛寺。尽管寺院的数目较小，发展也比较缓慢，但足以证明佛教在江西的传播时间很早，为以后佛教在江西的广泛传播奠定了良好基础。

2.2 两晋至南朝

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仍，社会动荡不安，传统的儒家思想衰微，佛教成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心理寄托，从上层走到了下层，从少数人走向了多数人，成为社会各阶层的信仰。佛教蓬勃发展，不再依附于儒、道，佛教宗派成立，佛经翻译规模更加盛大，寺院僧尼急遽增多，社会影响日深。频繁的战乱，大量的北方僧人来赣避难，促进了江西佛教的发展。江西成为佛教弘传的盛地，庐山东林寺以慧远为首，形成了南方的佛教中心。庐山佛寺林立，高僧云集，聚众讲经，弘扬佛法。其中，最著名的高僧是庐山东林寺慧远。慧远（334—416年），雁门楼烦人，“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③后师从当时的名僧释道安，“豁然开悟”，叹息“儒道九流，皆糠秕而”，故弃儒从佛。东晋太元六年（381年）慧远率弟子来庐山建龙泉精舍而住。太元九年（384年）江州刺史为慧远在庐山东面建东林寺，史载“远他造精舍，洞尽山美，却负得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垒基，即松栽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径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④慧远居庐山三十多年，影不出山，潜心修佛，派遣弟子出使西域，求取佛经。他组织了大规模的翻经译经活动，译出了《阿毗昙心论》、《三法度论》、《大摩多罗禅经》等经文，著书立说，弘扬佛法。

^① 香港《内明》杂志，1990年1月1日第214期，第3~11页

^② 韩溥《江西佛教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③ (梁)释慧皎《高僧传》卷6《释慧远传》

^④ (梁)释慧皎《高僧传》卷6《释慧远传》

同时，慧远及其弟慧持及门人修建了 20 多所寺院，如慧远在庐山建立的龙泉寺、上崇福寺、中大林寺、延福院、文殊寺等，在九江所创的龙池寺、定名寺、圆觉寺、天花寺、清泉寺、观音寺等，其弟慧持亦在九江建寺三所即胜果寺、高良寺、多佛寺，门下弟子昙诜建庐山上大林寺。慧远以其高尚的品德与渊博的学识，名扬天下，受到达官显贵与天下僧人的尊崇，“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并不期而至，望风遥集”。^①如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皆“并弃世遗荣，依远游止”。元兴元年(402 年)，慧远率弟子刘遗民等 12 人，在庐山东林寺共结白莲社，发愿往西方净土世界，成为后世净土宗的初祖。宋李觏评价他说“噫！汉代初传佛道，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亦循汉制。石季龙僭位，以其出自边戎，应从本俗，百姓有乐佛事者，特听之。当是时，谓之何哉？外国之神而已。及东晋宋氏，其法乃大。盖慧远居庐山，名虽为释，实挟儒术，故宗少文就之考寻文义，周续之通五经五纬而事之，雷次宗亦从而明三礼、毛诗。儒者尝为弟子，其人得不尊乎？”^②李觏的这段评论表明慧远借助儒学弘扬佛教，在江西乃至全国佛教界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到南朝时，频繁的改朝换代使得人心涣散，帝王更是把佛教作为维护统治工具加以重视。在南朝诸帝及显贵的支持下，佛教在江西的传播更加广泛，寺院普建。特别是梁武帝萧衍天监年间(502—519 年)，在鄱阳、余干、弋阳、新建等地相继创建了桐源寺、真觉寺、法慧寺、龙泉寺、后溪院、鹿苑寺等佛寺。梁武帝普通年间(520—527 年)，在余干县创立了白云寺、河湖寺、大木寺。大同年间(535—546 年)，于鄱阳、弋阳建造了华严寺、龙光寺、罗湖寺、广石寺、待宾院等寺院。纵观晋到南朝，江西佛教稳步发展，在庐山一带尤为盛行，般若、毗昙、涅槃、禅学诸说纷呈，高僧辈出。在时间上，主要集中在两晋和梁朝。前有慧远之深远影响，后有梁武帝萧衍极为佞佛，故这两个时期佛教在江西迅速传播开来。在地域上，集中在南昌、新建、九江、余干、鄱阳、弋阳、吉安等地。这些地区因是交通要地，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故佛教较其他地区更加兴盛。由此可见，经济是佛教传播的基础，良好的经济条件对佛教的传播、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这些经济富庶、文化发达的地区也是佛教努力争取信徒、扩大势力的地区。自然，佛教氛围浓厚，也极易出现高僧。

^① (梁)释慧皎《高僧传》卷 6《释慧远传》

^② (宋)李觏《李觏集》卷 24《承天院罗汉阁记》

2.3 隋唐时期

隋朝建立后，为巩固统治，维护安定，统治者对佛教采取了复兴的政策。隋文帝杨坚刚即位，即下令在全国复兴佛教，“是岁，隋主诏境内之民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于是时俗随风而靡，民间佛书，多于《六经》数十百倍”。^①仁寿四年（604年）下诏：“宣扬佛法，感悟愚迷”。分送舍利30余州立塔藏之。江西南昌和吉安等地，各建佛塔一座。隋炀帝杨广同样扶持佛教。隋平陈时，他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继位后，组织大规模的著经译经，度僧尼6200人。隋代在江西兴建的寺院有10几所，如修水兴化禅院、都率禅院、白土寺、内宫院、大余嘉祐禅寺、南昌天王院和塔、佛头院塔、安义保寿院等。佛教此时开始传播于修水、宜丰和大余三县。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统治者对佛教亦极为尊崇，广建寺庙，大度僧尼，弘扬佛法，佛教达到全盛时期。此时的江西，建寺之风盛行，全省有27个县建有10所以上的寺庙，其中南丰县竟建有71所寺庙，以至唐代有“求官去长安，求佛去江西”的说法。^②这一时期，佛教最显著的发展是禅宗的兴盛。禅宗六祖慧能顿悟于曹溪山南华寺，禅宗风靡全国，成为宋以后中国佛教的主流。慧能弟子怀让（677—744年）于南岳创南岳怀让系，另一高徒行思（？—741年）于吉州青原山创青原行思系。后南岳派分化为沩仰宗、临济宗；青原派分化为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这五宗中，沩仰宗是潭州沩山（今湖南长沙）灵祐（771—853年）及其弟子袁州仰山（今江西宜春）慧寂（807—883年）开宗，曹洞宗是筠州洞山（今江西宜丰）良价（807—869年）和抚州曹山（今江西宜黄）本寂（840—901年）创宗，临济宗发端于希运禅师主持宜丰黄檗寺。由此可见，禅宗渊源于江西，是其开宗立派的发源地。禅宗大师青原行思、马祖道一、百丈怀海、仰山慧寂、洞山良价、曹山本寂、黄檗希运等，在江西兴建佛寺，弘扬佛法，大兴佛教。至唐代，禅宗在江西盛传，律宗、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也是法系延绵，多有高僧，佛寺遍布全省。据清编省、府、州、山、县志记载，光马祖道一开山建寺的就有30多所，如宝华寺、法药寺、石磬寺、大唐寺、开阳寺、定明寺、净住寺、寿昌寺、梵慧寺、光福寺、大果院、正济寺、澄心寺等，地涉赣县、靖安、宜黄、安义、丰城、都昌、九江、新建、金溪等13个县。

^①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75《陈纪九》

^② 田勇、刘明光《江西佛教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许怀林在《十世纪前佛教在江西的传播》^①一文中提到,据清光绪《江西通志》卷121—125记载,江西地区从东汉末年(公元二世纪)到清朝后期,陆续修建而留存、记载下来的寺院、宫观,合计1517所,其中佛教寺院1115所。在佛寺中,东汉至南朝时期建立的有96所,隋唐五代时期建立的483所。《江西通志》所记的寺院,只可能是实际存在过的寺院的一部分或大部分,至于那些存在时间较短,或因缺乏记载而没有流传下来的寺院,自然不包括在内。五代以前江西建立的寺院(按照清代后期的府州建制排列)分布情况如下表2.1。

表2.1 东汉至五代时期江西各地寺院分布表

地区	时期							合计
	东汉	吴	晋	南朝	隋	唐	五代	
南昌府			16	6	3	52	2	79
瑞州府			2		2	21		25
袁州府		1	1	1		23	1	27
临江府			2	1	1	13	3	20
吉安府		5		1	1	67	11	85
抚州府			2		1	43	3	49
建昌府						27	10	37
广信府			3	2		42	5	52
饶州府	1		1	14		57	6	79
南康府			3	3	1	20	1	28
九江府	1		21	1	1	21	11	56
南安府					1	7	4	12
赣州府		1	2	3		16	4	26
宁都州			2			2		4
总计	2	7	55	32	11	411	61	579

资料来源:转引自许怀林《十世纪前佛教在江西的传播》,江西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第29页

从《江西通志》统计的一系列数字来看,佛教早在东汉时期就传入江西,东汉到三国是初传期,晋至南朝是稳步发展期,唐朝达到了鼎盛期。诸宗竞秀,高僧辈出,寺院遍布全省各地。这说明佛教在江西社会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交织、相互融合,在江西历史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① 许怀林《十世纪前佛教在江西的传播》,江西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第28~29页

第3章 宋代江西佛教

有宋一代，佛教由于得到统治者的扶持，从而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流布。江西佛教在这样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在前代繁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宋代江西佛教的兴盛不是偶然的，它与当时江西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3.1 宋代佛教发展概况

唐末五代，北方战乱不息，民生凋敝，频频遭受法难打击的佛教，更是毁损殆尽。反观南方诸国，社会安定，国主崇信佛教，创宗于南方的禅宗与净土宗，因条件优越，更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宋初，禅宗之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宗并盛，但终两宋之世始终不衰的是临济、云门二宗。仁宗年间（1023—1063年），临济宗又分化为黄龙、杨岐两派。黄龙派为隆兴府黄龙山（今江西南昌）慧南（1002—1069年）所创，杨岐派为袁州杨岐山（今江西萍乡）方会（992—1049年）所创，兴盛于江西境内，亦称宗，禅宗呈现出“五家七宗”的盛况。详见附录A（禅宗五家七宗表）。禅宗诸宗大多直接或间接开宗立派于江西本土，弘扬佛法于江西全境。五家七宗，在两宋枝脉繁盛，传承不断。江西是禅宗的发源地，亦是净土宗的发源地。宋太宗时杭州昭庆寺僧省常（959—1020年），仿效东晋庐山东林寺慧远结莲社故事，与士人、僧众结净行社，提倡念佛。当时朝廷士大夫及文人纷纷入社，其他各宗也都提倡念佛的修行，从而使得净土宗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盛行于宋代的佛教宗派还有天台宗、华严宗、律宗。天台宗，入宋以后，经义寂、义通、慈云尊式、四明知礼再度中兴，宗风大振。律宗，宋初贊宁有律虎之称，其后的允堪、元照将本宗风发扬光大，法系得以不绝。

两宋时期，佛教宗派繁盛，亦涌现了诸多禅师高僧。如临济宗的汾阳善昭（947—1024年）、慈明楚圆（986—1039年），杨岐宗的杨岐方会（992—1049年）、佛果克勤（1063—1135年）、大慧宗杲（1089—1163年），云门宗的大觉怀琏（1009—1090年）、灵隐契嵩（1007—1072年），曹洞宗的丹霞子淳（1064—1117年）、弘智正觉（1096—1156年），天台宗的四明知礼（960—1028年）、

孤山智圆（976—1022年），律宗的贊寧（919—1001年）、允堪（1005—1061年）。这些著名的禅师高僧，以寺院庙观为道场，聚众讲经说法，传徒普度众人。此外，他们都德行高尚，在普通民众中具有极高的威信，对他们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因而，吸收了大量的平民信奉释教，扩大了佛教信徒的社会基础。

佛教在宋代广为流传，帝王将相、达官显贵，兴佛建寺，寺院遍布全国。陆游说：“予游四方，凡通都大邑，以致遐陬夷裔，十家之聚，必有佛刹”。^①朱熹说：“今佛老之宫遍满天下，大郡至逾千计，小邑亦或不下数十。”^②真宗景德年间，“天下两万五千寺”。^③至真宗晚期，全国佛教寺院达4万所之多。由于广度僧尼，僧尼数量也直线上升，建国初两京诸州的僧尼是67430人，到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僧尼达458854人。^④全国佛寺星罗棋布，僧尼众多，佛教之兴盛可见一斑。

3.2 宋代江西佛教的特色

五代，江西先属杨吴，后属南唐。统治者均能注重社会秩序的安定与经济的发展，且多信奉释教，兴寺建庙之举不绝，为宋代江西佛教的勃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入宋以后，江西成为佛教弘扬传播的要地。禅宗“五家七宗”、净土宗、律宗、华严宗等诸宗在赣传承不断，名僧大德层出不穷。黄庭坚谓“江西多古尊宿道场，居洪州境内者以百数。”^⑤吴潜说：“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⑥这段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江西佛寺数量位于全国的前列。江西僧尼的人数也位居全国的前列。据《宋会要辑稿》所载，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各路僧尼人数分别是：东京22941，京东18159，京西18219，河北39037，河东16832，陕西16134，淮南15859，江南54316，两浙2220^⑦，荆湖22539，福建71080，广南24899。宋代江西包括江南西路和江南东路的饶、江、信州及南康军，由此能够推测在江南僧尼数额中江西占的比重是

^①（宋）陆游《渭南文集》卷19《法云寺观音殿记》

^②（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13《辛丑延和奏札七》

^③（宋）江休复《杂志》

^④（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道释1之13

^⑤（清）同治《南昌府志》卷14《寺观》

^⑥（宋）吴潜《许国公奏议》卷2《奏论计亩官会一貫有九害》

^⑦据《宋会要辑稿》记载真宗天禧五年僧尼达458854人。而两浙路才2220人，令人存疑。游彪在《论宋代寺院经济的地域差异》一文中认为，将《会要》里的僧尼总数减去诸路僧尼人数大致就是两浙路的人数了，其数额为96532人。

很大的。刘锡涛在《宋代江西地理文化研究》认为，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左右，江西僧尼约为36000余人。^①佛教在江西的广泛传播，带动了佛教文化的繁荣昌盛，促进了江西社会文化的发展。考察宋代江西佛教，笔者认为有着如下几个特色：

3.2.1 禅宗兴盛 高僧辈出

唐末五代，禅宗一花五叶，竞繁于江西境内。有宋一代，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各有传承，禅师数以千百计。临济门下方会在杨岐山创立杨岐派，慧南在黄龙山创立黄龙派，以“三关”之法接引后人。两派亦称宗，大禅宗风，法席殊盛。

曹洞宗，法席颇盛，力弘于赣。自云居道膺（835—902年）一系法脉绵延不断，到芙蓉道楷（1043—1118年）宗风大盛。道楷传丹霞子淳、净因法成、洪州宝峰惟照、石门元易、净因自觉等。洪州（今江西南昌）宝峰阐提惟照（1084—1128年），“简州李氏子，……宣和壬寅，诏补圆通，弃去。复居泐潭”^②。惟照禅师在庐山圆通寺三年后，迁靖安泐潭宝峰寺，授徒弘法。惟照又传江州（今江西九江）圆通德止。圆通德止（1080—1135年），“宣和三年春，徽宗皇帝赐号真际，俾居圆通”^③，于庐山圆通寺弘扬曹洞宗风。此外，庐山圆通寺的正觉、嗣宗，庐山东林寺通理，樟树慧力寺僧悟，都是力弘曹洞宗的禅师。

云门宗，宗匠弘法，极盛一时。系下著名高僧有怀琏、居讷、晓聪、契嵩、晓舜、守亿、佛印了元等，为朝野内外推崇。怀琏大觉（1009—1090年），“韶龄出家，……即慕参寻，远造泐潭法席，投机印可。师事之十余年，去游庐山。掌记于圆通讷禅师所”。^④圆通居讷（1010—1071年），“十一出家，十七试法华得度。……后游庐山，道价日起。由归宗而迁圆通”。^⑤契嵩（1007—1072年），“藤州镡津李氏子也。七岁出家。既受具，尝戴观音像诵其名号，一日十万声。经传杂书靡不博究。得法洞山聪公。明道间，从豫章西山欧阳氏昉借其家藏之书，读于奉圣院，遂以佛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著为原教篇”。^⑥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赐号“明教大师”。佛印了元（1032—1098年），“浮梁林氏子。游庐

^① 刘锡涛《宋代江西文化地理研究》，陕师大博士论文，2001年版，第112页

^② (宋)普济《五灯会元》卷14《曹洞宗》

^③ (宋)普济《五灯会元》卷14《曹洞宗》

^④ (宋)普济《五灯会元》卷15《云门宗》

^⑤ (宋)普济《五灯会元》卷15《云门宗》

^⑥ (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38

山谒开先暹道者。……又谒圆通讷”。^①后嗣开先暹道之法，住江州（今江西九江）承天寺，庐山开先、归宗寺等。这些云门禅僧，弘法传徒，佛法传布甚广。

法眼宗，亦盛于赣。云居道齐（922—997年），“洪州金氏子。徧历禅会，学心未息。后于上蓝院主藏经”。^②他住高安大愚山、幽谷山双林禅院、江西云居山等处共三十年。其中主持永修云居山真如寺20余年，于此著《语要搜玄》和《拈古代别》等。传法弟子有南康云居契环、杭州灵隐文胜、明州广惠志全等人。临江军（今江西清江）慧力院绍珍禅师、洪州（今江西南昌）大宁院庆总禅师、南康军（今属江西赣州）罗汉行林祖印禅师，亦大弘云门宗风。

黄龙宗与杨岐宗，此二宗由临济宗衍出，宗风大盛，法系绵绵不绝，繁衍传播。黄龙宗的开山祖师慧南（1002—1069年），“信州章氏子。依泐潭澄禅师，分座接物，名振诸方”。^③主持庐山归宗寺，迁宜丰黄檗山，晚年主持修水黄龙山崇恩禅院。其后继宗匠有隆兴府（今江西南昌）黄龙崇恩禅院黄龙祖心、庐山东林寺东林常总、庐山归宗寺宝峰克文、南康军云居真如院元祐、虔州（今江西赣州）廉泉院昙秀等。杨岐宗的开宗者方会（992—1049年），袁州宜春冷氏子，问佛于临济宗宗匠慈明楚圆，后主持杨岐山普通寺，门风大盛。后继宗匠有江州（今江西九江）承天寺白云守端禅师、抚州金溪蔬山寺归云如本禅师、永修云居山真如禅寺圆悟佛果克勤禅师等。

3.2.2 佛寺林立 分布广泛

宋代江西禅师辈出、高僧云集，在朝廷的重视下，他们与地方官吏共同努力，不仅修复了原先的寺院，而且还在各地兴建了一批新的佛寺。笔者根据清光绪《江西通志》统计，全省13个州军68个县都有佛寺分布，共有佛寺1178所。见表3.1（宋代江西佛寺分布表）。实际情况远不止如此，有相当一部分佛寺未载于通志。属宋代兴建的佛寺共有161所。见附录B（宋代江西佛寺兴建表）

表3.1 宋代江西佛寺分布表

地区	寺数	地区	寺数	地区	寺数	地区	寺数
南昌县	38	义宁州	9	清江县	18	吉水县	12
新建县	35	高安县	16	新淦县	15	永丰县	10

^①（清）同治《九江府志》卷51《仙释》

^②（宋）普济《五灯会元》卷10《法眼宗》

^③（宋）普济《五灯会元》卷17《临济宗》

续表

丰城县	9	上高县	17	新喻县	8	安福县	12
进贤县	13	新昌县	17	峡江县	9	龙泉县	2
奉新县	13	宜春县	9	吉安府	7	万安县	11
靖安县	12	萍乡县	12	卢陵县	29	永宁县	9
武宁县	10	万载县	19	泰和县	25	永新县	9
抚州府	9	上饶县	11	万年县	3	上犹县	7
临川县	7	玉山县	16	星子县	25	崇义县	3
崇仁县	18	弋阳县	15	南康府	1	赣县	13
金溪县	10	贵溪县	13	都昌县	5	雩都县	3
宜黄县	16	铅山县	15	建昌县	12	信丰县	6
乐安县	14	广丰县	13	安义县	7	兴国县	9
东乡县	8	兴安县	4	德化县	22	会昌县	4
建昌府	3	饶州府	2	德安县	16	安远县	9
南城县	14	鄱阳县	24	瑞昌县	14	龙南县	4
南丰县	11	余干县	11	湖口县	8	长宁县	5
新城县	18	乐平县	13	彭泽县	9	宁都州	5
广昌县	10	浮梁县	16	大庾县	11	瑞金县	3
泸溪县	10	德兴县	15	南安府	3	石城县	4
广信府	1	安仁县	16	南康县	6		

资料来源：清光绪《江西通志》卷121—125《寺观》

从表3.1可以看出，佛教在江西广为传播，寺院众多，随处可见。朱熹说庐山一带佛寺“盖以百数”，布满全山。洪州分宁县寺院的数量也很可观，“县郭内外，名为宫者百八十余所”。^①将表中各县的寺院数量加以统计，会发现洪州、吉州、饶州三州的寺院数量明显超过江西其他各州。这些地方共同的特征就是经济、文化发展较快，比较富庶。如高安“其人稼穡渔猎，其利粳稻竹箭梗楠茶楮，民富而无事”，^②饶州“盖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户羨，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③吉安“山雄水秀人才辈出，地利亦饶甲

^① (宋)曾巩《曾巩集》卷18《兜率院记》^② (宋)苏辙《栾城集》卷23《筠州圣寿院法堂记》^③ (宋)洪迈《容斋四笔》卷5《饶州风俗》

于诸郡”。^①富裕的经济先进的文化，为佛教在这些地区的快速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尽管佛寺遍布全省各地，却也存在着地区发展分布的不平衡性。

从附录B(宋代江西佛寺兴建表)来分析，宋代江西兴建佛寺的主体是僧人，其次为地方官吏和富室大户。寺院是僧尼生活与进行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为了更广泛的弘扬佛教，吸收佛教信徒，扩大佛教的社会影响。僧人或化缘募敛、或求助于官府富户，积极兴建寺庙。如僧介庵，于太祖开宝二年(969年)在万载县创立保安院。僧云明，开宝三年(970年)在庐陵县创建明心院。广济坚禅师，于真宗咸平中(998—1003年)在星子县建能仁罗汉寺。僧怀间，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在永宁县建立曲观寺。僧佛印，于仁宗嘉祐中(1056—1063年)，在湖口县创建下钟山寺。僧人建寺的例子在清光绪《江西通志·寺观》中俯拾皆是，由他们主持兴建的寺院占宋代江西新建佛寺的绝大部分。此外，地方长官与富裕大户也为佛寺的修建做出了努力。地方长官创建的佛寺典型的有以下几所：仁宗景祐间(1034—1038年)，驸马都尉张冥淑在吉水县创建济渡庵。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张商英知洪州，在黄龙崇恩禅院“建佛牙大阁，东西方丈，堂库厨寮，石桥水亭，二百间有奇”。^②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参军石松在泸溪县修建了安定寺。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新昌县知县建立净戒寺。江西地方的富室大户亦热衷于捐献财物，修建寺院。高安县圣寿寺，即为北宋中期省聰和尚与富户吴智讷共同修建。“郡有吴智讷者，治生有余，辄尽之于佛，既为僧舍之后室，又为聰治其法堂，极壮丽，凡材甓、金漆皆具于智讷”。^③广昌县大觉寺，是北宋中叶生员刘万年的妻子毛氏“捐资八百两建造”。^④奉新县宝莲院，是南宋宁宗嘉定(1208—1224年)时，富户刘氏出钱修建。刘氏将“新安乡田地，岁收百余斛及山地之利，永舍充于宝殿长命灯鉢”。^⑤宋代江西佛寺林立，分布广泛，是在封建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地方长吏、富室大户扶持与僧人本身共同努力的结果。

3.2.3 佛教文化 繁荣昌盛

佛教的昌盛，使江西社会文化艺术融入了佛教因素。僧人在诗文创作、佛教典籍的编撰、书法金石上建树不凡。精美的佛塔建筑、佛像雕塑也昭示着佛教

^①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48《风俗》

^②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121《黄龙崇恩禅院》

^③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222《圣寿院记》

^④ (清)同治《广昌县志》卷8《重修大觉寺碑记》

^⑤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121《宝莲院记》

在古典文化艺术上繁盛。

宋代江西，文风鼎盛，僧人亦好“诗书而尊儒雅”。士人因寺院幽静适合潜思静修，常“寄寓于寺”，与僧人赋诗对唱。因此，也涌现出一批著名的诗僧。被誉为“禅门司马”的惠洪，筠州（今江西高安）新昌人，“正净文禅师之法嗣，住清凉院”，^①“与黄山谷善，又习其乡欧阳、王、曾诸公之作”，“才名籍甚，聪明绝世”。^②早年诗名动京师，黄山谷赐诗赞赏：“韵胜不减秦少游，气爽绝类徐师川”。他一生著作甚厚，是宋代作品最多的诗僧。主要作品有《石门文字禅》、《甘露集》、《冷斋夜话》、《志林》、《林间录》等。正宗，“崇仁人，恭考峰禅师，大悟工诗，居梅山。吕本中曾几韩驹寓临川，日宗游其门。有愚邱诗集”。^③江西诗派的善权，靖安县人，亦为一代诗僧，著有《真隐集》，后人称“巽中下笔，豪俊峻嶒。余每诵之，辄能兴起”。^④其他还有古梅、祖可、文惠、怀贤，皆是江西大地上名动一时的诗僧。此外，以编撰佛教典籍闻名的有祖秀与晓莹。祖秀，江西人，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年），入住南昌县澄心寺，先后著《佛运统记》、《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僧宝正续传》。晓莹，江西人，大慧宗杲的弟子。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居罗湖寺，著《罗湖野录》。在书中有他自撰的《序》，谈及成书的由来。“因追绎畴昔出处丛林其所闻见，前言往行不为不多，或得于尊宿提唱、朋友谈说，或得于断碑残碣、蠹简陈编。岁月浸久，虑其湮坠。故不复料拣铨次，但以所得先后，荟萃成编，命曰罗湖野录。”^⑤晚年居丰城感山云卧庵期间，著《云卧纪谈》，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故“南宋以来，修僧史者鲜不利用其书也”。^⑥

佛门僧人长期进行抄写、镌刻佛经活动，在金石与书法艺术上造诣颇深，僧人书家辈出。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沙门惠光于南城上蓝院书丹《新修上蓝院记》碑，是佛门书法金石中的佳品。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杨岐宗三世觉显书丹重刻《西堂智藏禅师塔碑》，书写工整遒劲。至今仍存赣县龚公山宝华寺，成为珍品。黄龙宗祖师慧南书法艺术超群，“点划奇劲如空中之雨，大小萧散出于自然”，特别是其手抄《四十二章经卷》，“笔法深稳庄重，而若缠得颜平原用

^① (清)雍正《抚州府志》卷30《仙释》

^② 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1页

^③ (清)雍正《抚州府志》卷30《仙释》

^④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180《艺文》

^⑤ (宋)晓莹《罗湖野录》序

^⑥ 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3页

笔意。”^①神宗元丰中，僧思顥擅长书法。官吏陈绎令其书丹“卷石岩”三字镌刻于高安云门寺侧巨石上，笔法苍劲有力。

佛教的兴盛，促进了佛塔建筑、佛像雕刻工艺的进步。佛塔佛像造型优美，技艺高超。佛塔建筑方面，赣州慈云塔、安远无为塔、石城宝福院塔、袁州兴化禅院塔，挺拔秀丽，十分壮观。赣州慈云塔，在慈云寺内，“高十数仞，九级檐栏周迴”。^②始建于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塔底有“天圣二年女弟子陶氏一娘舍钱二十吊”和“舍利塔僧”等铭文砖。安远无为塔，在大头寺后，建于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塔计九层，高十五丈”。^③石城宝福院塔，在宝福院后，建于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僧应可募造，“塔中叠级，层楼外绕栏槛”。^④袁州兴化禅院塔，哲宗绍圣三年（1096年），“袁州兴化禅院，太平山西南出红光，有石塔七层高十五丈”，^⑤元符二年（1099年）诏赐塔额为“会庆”。佛像雕塑方面，镌刻于岩壁的石窟佛像著名的有二：赣州通天岩石窟，北宋徽宗时（1101—1125年），无尽居士张商英于通天岩开凿佛像，赵抃题名。佛像栩栩如生，雕刻技艺精湛，是佛像艺术中的精品。弋阳圭峰南岩石窟，洞内石龛原雕塑有四十余座佛像，宁宗嘉定年间（1208—1244年）邑人王元续凿石为诸佛像。南岩石窟是国内最大的一座自然洞窟中开凿的佛像石窟。

3.3 宋代江西佛教繁荣的原因

宗教的兴起与发展是在一个大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的，不能够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与背景。考察宋代江西佛教繁荣的原因，有着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因由。

3.3.1 政治：宋帝的崇佛政策及地方官吏的护持

宋代统治者自建国始，就一反后周毁佛的做法，对佛教采取了复兴与保护的政策。其目的有二：一是借鉴佛教弘善抑恶，安抚民心的作用，即“使人为善，去恶反邪，归正遵王法而免祸患”^⑥。二是维护统治秩序。宋太宗曰“浮屠

^①（宋）惠洪《石门文字禅》卷25《题黄龙需和尚手抄后三首》

^②（清）同治《赣州府志》卷16《寺观》

^③（清）同治《赣州府志》卷16《寺观》

^④（清）道光《石城县志》卷3《寺观》

^⑤（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道释2之5

^⑥（清）光绪《江西通志》卷1

氏之教，有裨政治”，^①宋真宗曰“道释二门，有助世教”，^②体现了宋王朝护持佛教的政治意图。因此，宋代诸帝无不崇信佛教。

开国皇帝宋太祖自建国初就确立了崇佛的政策。建隆元年（960年）二月，太祖就下诏普度童行8000人。三月，下诏“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毁者存之”。^③乾德五年（967年），又下诏“应诸郡有铜像处，依旧存留”。^④这些诏令表明宋太祖停止了后周废佛的措施，而实行复兴佛教的政策。与此同时，太祖还大力支持佛教活动。乾德三年（965年）十二月，沧州僧道圆携经从西域还，“表献贝叶梵经”，太祖“召问所历山川道里，赐紫衣器弊馆于京”。^⑤乾德四年（966年）三月，僧行勤等157人请前往西域取经，太祖“各赐钱三万遣之”。^⑥宋太宗“素崇尚释教”，继续执行太祖的崇佛政策。他对佛教基本态度是“崇奉为先”，“名山大川，灵迹胜境，仁祠仙宇，经之营之，致恭之诚广也”。^⑦太宗扶植佛教，表现在大度僧尼、修建佛寺、翻译佛经上。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九月，太宗因“眷言求度之人，颇限有司之制”，故“先系籍童行、长发，并特许剃度”。^⑧至道元年（995年）六月，诏令江南、两浙、福建僧尼，“以见在僧数，每三百人放一人”。^⑨在位期间，普度僧尼的数额极大，“凡度一十七万人”，太宗朝僧尼数量剧增。雍熙二年（985年）四月，太宗在他的诞生地修建“启圣禅院”，规模宏伟，“所费钜数万计”。^⑩在遣使取回杭州释迦佛舍利后，于开宝寺西北地，“造浮屠十一级以藏之”，“上下三百六十尺，所费亿万计，前后逾八年”，“巨丽精巧，近代所无”。^⑪五台山十寺、峨眉山五寺的重修都是在太宗时期完成的。为便于翻印佛经，太宗时还专门设立了译经院。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因命内侍郑守钧，就太平兴国寺，建译经院”，“诏天息灾等各译一经以献”。^⑫僧人常谨、清沼、法进等同笔受缀文，光禄卿汤悦、兵部员外郎张洎参祥润色，内侍刘素为都监。译经院的设立，恢复了自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冬十月甲申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景德三年八月乙酉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六月辛卯

^④ (宋)志磐《佛祖统记》卷43

^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道释2之5

^⑥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道释2之5

^⑦ 《宋大诏令集》卷223，道释上，《以太宗御制妙觉集编入佛经大藏诏》

^⑧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九月己丑朔

^⑨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道释1之15

^⑩ (宋)钱若水《太宗实录》卷33

^⑪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端拱二年八月癸亥

^⑫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六月

唐元和以后中断的译经工作，对宋代佛经的翻译和传播有积极作用。

真宗亦大兴佛事，是崇佛政策的奉行者。咸平元年（998年），御著《释氏论》云：“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而道同，大指劝人之善，禁人之恶，不杀则仁矣，不窃则廉矣，不惑则正矣，不妄则信矣，不醉则庄矣。苟能遵此，君子多而小人少”。^①认识到佛教“有裨政治”，真宗对寺院屡加赏赐，且普度僧尼。咸平三年（1000年），赐田给南康军罗汉禅院，名为圣惠庄，以供赡养僧徒之用。^②景德四年（1007年）八月，派遣使者修葺泗州僧伽塔，“内出供帐什物给之”。^③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诏赐黄金三千两，用于增修峨眉普贤寺，同时斋僧三万人。为广度僧尼，真宗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在诸路立戒坛72所，分布全国，使得僧尼数量日益增多。到天禧五年（1021年）僧众397615人，尼61240人，寺院4万余所，^④达到了宋代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真宗后的仁、英、神、哲四朝，大体上都奉行崇佛政策，表现在行为上是召对禅师，修饰佛像。如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派使者以缘绵尺书请庐山圆通居讷住持十方净因禅院。讷称目疾，不能奉诏，遂举寺内书记怀琏。仁宗召对化成殿，“问佛法大意，奏对称旨，赐号大觉禅师”。^⑤

神宗年间（1068—1085年），为表彰江西永修县云居山真如寺佛印了元禅师的师德，赐其“高丽庶衲金钵”。^⑥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诏法云寺法秀禅师在先帝神御前说法，赐号“圆通”。元祐三年（1088年），赐黄金予庐山东林寺，用于修饰神运等五殿的佛像。徽宗朝虽一度实行抑佛政策，但很快恢复，对佛教影响不大。

南宋偏安一隅，诸帝更加重视佛教“有助世教”的政治作用，继续贯彻崇佛政策。其基本行为是礼对高僧，赐钱物额号。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正月，诏杨岐宗宗匠佛果克勤入对，奏对称意，赐“圆悟”之号。高宗敕住江西永修云居山真如禅寺。绍兴八年（1138年）诏赐天下僧尼敕缕度牒，大范围内广度僧尼。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八月，“抚州宜黄县白土院饶氏菩萨封普惠大师”。^⑦淳熙三年（1176年），孝宗诏报恩寺住持德光觐见。德光，江西新余人，嗣法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咸平二年八月丙子

^② (宋)陈舜俞《庐山记》卷2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6，景德四年八月丁酉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道释1之13

^⑤ (宋)普济《五灯会元》卷15《云门宗》

^⑥ (清)雍正《饶州府志》卷31《仙释》

^⑦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道释1之13

杨岐宗大慧宗杲。孝宗与德光对答甚悦，赐号“佛照”。

尽管在某些特殊时期，宋朝统治者对佛教给予限制。但总体上来说，宋王朝对待佛教的态度是开明的。诸帝的崇佛政策，使得佛教获得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统治者护持佛教的活动，惠及全国，江西自然也深受其利。最高统治阶级护持佛教，上行下效，地方官吏与豪绅亦崇奉佛教。江西官吏中信佛护佛的诸多，与佛门高僧往来密切，有助于佛教在江西的发展。如太宗淳化四年（993年），九江太守请法眼宗的慧诚禅师主持庐山归宗寺，慧诚入主归宗故刹14年，聚徒500余众，使归宗寺扬名天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范仲淹出守鄱阳，因慕承古禅师“操行高洁，秉性虚明”，迎居荐福寺，“开阐宗风，会在寺追荐母云”。^①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年），建昌李常曾于庐山五老峰白石僧舍读书，中举人后舍宅建寺院，即庐山楞伽院和白石庵。英宗治平间（1064—1067年），程公孟为洪州太守，游黄龙寺，捐金置田。治平二年（1065年），敦请名僧慧南入黄龙寺为住持。绳金塔位于南昌城南，一度遭遇火灾，有所损毁。治平间，知军州事程公某，“以其有关於民鸠钱二十五万修之”。^②神宗熙宁初，朱彦守抚州。觉范禅师（惠洪），“住清凉寺有重名”，故朱彦“请开法于州之景德寺”。^③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刘述守九江，召怀贤主庐山圆通寺，欣然从之。^④神宗元丰初，“革律为禅”的诏令颁布后，庐山东林寺由律院改为禅院。时学士王韶守南昌，延请黄龙宗宗匠常总入寺住持。^⑤哲宗元祐中（1086—1094年），杨时任虔州（今江西赣州）司法，常与庐山东林寺常总禅师问佛论道，受益匪浅。南岡寺位于吉水县，哲宗绍圣中（1094—1098年），“黄庭坚延请青原僧惟信主持。政和间，张商英言于朝敕赐为崇义禅寺”。^⑥高宗绍兴间（1131—1162年），“尚书张公某來佩郡符复倡葺之”。^⑦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驻江州（今江西九江），“请到禅僧惠海主持江州庐山东林禅院”。后请朝廷赐慧海“一佛心禅师”师号，从之。^⑧隆兴寺位于吉安府，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年），“通判孙霖命僧秉雍新之”。^⑨

^① (清)雍正《饶州府志》卷31《仙释》

^②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121《寺观》

^③ (清)雍正《抚州府志》卷30《仙释》

^④ (清)同治《九江府志》卷51《仙释》

^⑤ (清)同治《九江府志》卷51《仙释》

^⑥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121《寺观》

^⑦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121《寺观》

^⑧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道释1之7

^⑨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123《寺观》

佛教的兴衰，与朝廷的宗教政策息息相关。政府对其支持拥护，则能够兴盛，反之，则衰败。有宋一代，诸帝的保护佛教的诸多举措和亲佛行动，昭示了宋王朝对待佛教的基本国策。这就为佛教自身的发展和民众的个人信仰提供了一个正常、稳定的政治环境。国家政权给予佛教政治上的承认，促进了佛教的隆兴。佛教的繁盛又起到了稳定政权，巩固统治的作用。因此，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受王朝崇佛政策及护佛活动的影响，江西地方长官与豪门大户亦热衷于奉佛兴佛，佛教就在全境内获得了进一步繁盛的良好政治空间。宋代江西佛教繁荣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宋王朝的崇佛政策及江西地方长吏对佛教的护持。

3.3.2 经济：发达的江西地方经济

早在南朝时期，江西地区农业经济就得到了开发，物产丰饶。南朝刘宋雷次宗《豫章记》曰：“地方千里，水路四通，风土爽垲，山川特秀，奇异珍货，此焉自出。奥区神皋，处处有之。嘉蔬精稻，擅味于八方，金铁篋箔，资给于四境，沃野开闢，家给人足，畜藏无阙”。^①这段话描述了豫章郡的经济富饶。及至宋代，在政府的重视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下，江西经济更是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如高安“其人稼穡渔猎，其利粳稻竹箭楩楠茶楮，民富而无事”，^②饶州“盖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户羨，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③鄱阳“滨湖蒲鱼之利，膏腴七万顷，柔桑蚕茧之盛”，^④乐平“沃壤地宽，兼通山泽之利”，^⑤吉安“山雄水秀人才辈出，地利亦饶甲于诸郡”。^⑥江西“其田宜秔稌，其赋粟输于京师为天下最”，^⑦“茗卉、冶铸、金帛、秔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⑧

江西经济繁荣首先表现在农业的发达上。农业的发展与水利设施及农田开垦紧密相关，地方政府与民众在这两方面不遗余力。各级地方官吏尤为重视水利设施的建设，如南宋高宗绍兴十六年（1146年），知袁州张成巳言：“江西良田，

^①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48《风俗》

^② (宋)苏辙《栾城集》卷23《筠州圣寿院法堂记》

^③ (宋)洪迈《容斋四笔》卷5《饶州风俗》

^④ (宋)洪迈《容斋五笔》卷6《鄱阳七谈》

^⑤ (清)雍正《饶州府志》卷3《风俗》

^⑥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48《风俗》

^⑦ (宋)曾巩《元丰类稿》卷19《洪州东门记》

^⑧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48《风俗》

多占山冈，望委守令讲陂塘灌溉之利”。^①张成已要求袁州的大小守令认识到陂塘灌溉对农田的重要性。宋代江西的转运使、知州、县令等各级长官在修堰陂塘、圩垾、沟洫、筑堤堰上竭尽全力，兴修了大量的农田水利工程。如洪州（今江西南昌），北宋前期，洪州知州程师孟“积石为江堤，浚章沟，揭北闸，以节水升降，后水无患”。^②丰城“明道二年，县令徐绍龄始成之堤凡三级，级高一丈，袤一百五十丈。绍兴十六年，县令胡连再加修，治高四丈，广袤各二十丈”。^③上高“嘉熙间，县令江湘筑坡堰，以利灌溉”。^④清江“淳熙间，程大昌为江西转运副使，修复清江县破坑桐二堰，以捍江护田及民居地几千顷”。^⑤安福“治平间，县令黄中庸筑堤灌田一万三千亩”。^⑥临川“淳祐间，筑陂长三百丈，浚渠广二十丈”。^⑦泰和“庆元中，卓洵以朝奉郎知吉州泰和县，访求水利，得小江一道，发源武山。东行四十里，……以合大江，其流低洼，田亩高迥，桔槔难施，营创六闸，务潴泄以救旱涝，共灌田一万余亩”。^⑧据统计，南宋淳熙元年（1174年），江南西路（主要为今江西）9州军43县共修陂塘沟洫达2245所，可灌溉面积增至44244倾。^⑨水利事业的建设，使农田获利颇多。加之，新的土地利用方式“梯田”的开垦，使江西的土地开垦面积扩大。如南丰“盱江南北，地方千里，田如锦绣，树如烟云，原隰高下，稍涉腴美，则鲜有旷土”。^⑩由此，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江西成为贡粮的主要来源地。所谓“惟本朝东南岁漕米六百万石，以此知本朝取米于东南者为多。然以今日计，诸路共六百万石，而江西居三之一，则江西所出为尤多”。¹¹

其次，江西的经济作物品种繁多，主要有茶、柑橘、棉花、桑叶、桐树、竹等。根据清光绪《江西通志》记载，茶树种植遍布在虔州、袁州、饶州、洪州、抚州、筠州、江州、信州及临江、建昌、南康、南安军等8州4军，茶叶产量居全国首位。北宋每年茶课为2306万斤，江西地区为685万斤，占总课数的30%，居全国第一；南宋绍兴末年（1162年），全国课茶1781万斤，江西地区为463

^① (元)脱脱《宋史》卷173《食货志》

^② (元)脱脱《宋史》卷246《程师孟传》

^③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62《水利》

^④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64《水利》

^⑤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62《水利》

^⑥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64《水利》

^⑦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64《水利》

^⑧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64《水利》

^⑨ (元)脱脱《宋史》卷96《河渠志》

^⑩ 曾致光《春日至云庄记》见(明)正德《建昌府志·秩官》

¹¹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3《唐宋运漕米数》

万斤，占总课数的 26%，仍居全国第一。^①手工业方面，冶铸业中，临川、德兴、雩都等地盛产锡、铜、铅、铁等矿物质，朝廷设铁场、铜场、银场开采挖掘。如信州（今江西上饶）铅山铜场规模很大，最盛时“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②每年的炼铜数额为三十八万斤。^③陶瓷方面，吉州（今江西吉安）、饶州（今江西波阳）的瓷器名满天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 年），吉州已是“民物繁庶、舟车辐辏”的天下三镇之一的瓷城。周煇《清波杂志》记载：“饶州景德镇，陶器所自出，于大观间窑变，色红如朱砂。……比之定州红瓷器，色尤鲜明”。^④可见景德镇瓷器技艺之高超。造船业方面，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北宋天禧末年，天下各州每年打造的漕船共有 2916 艘，其中虔州、吉州每年造船为 1130 艘，居全国首位。^⑤此外，宜黄的私人造船业相当兴盛，称为“相船”。所以宋人说“舟船之盛，尽于江西”。^⑥

任何宗教信仰的传播都不是凭空进行的，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只有在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寺院才能够得到来自各级官府与民间信徒的捐赠与布施。唯有此，佛教才能生存发展下去。江西经济如此的富庶，为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江西民众在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虔诚希望通过敬佛尊佛来消除灾难，在西方极乐世界得到永生。如洪州、吉州、饶州、信州等地，经济富庶，物产丰盛，亦是佛教广泛传播，寺院众多的地区。由此可见，发达的江西经济为佛教的迅速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

3.3.3 文化：好巫尚鬼的地域文化

《宋史·地理志四》说：“江南东西路，盖《禹贡》扬州之域，当牵牛、须女之分。东限七闽，西略夏口，南抵大庾，北际大江。”由于特定的历史地理原因，江南文化具有信巫、好祀、尚鬼神的鲜明特点。宋代江西，大致属于“江南”这一范围，因而民风也好巫尚鬼。尚巫的习俗，弥漫于整个江西社会。如南安府“信巫鬼好鬻鬼”，^⑦ 南昌府“机鬼之俗习而未变”，^⑧ 瑞州府“江汉之俗尚鬼故其民

^① 刘清荣《宋代江西农业的进步及原因分析》，江西社会科学，2006 第 2 期，第 241 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 34 之 27

^③ 许怀林《试论宋代江西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1982 年版，第 657 页

^④ (宋)周煇《清波杂志》卷 5 《定器》

^⑤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25 《漕运》

^⑥ (宋)王谠《唐语林》卷 8

^⑦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 48 《风俗》

^⑧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 48 《风俗》

尊巫而淫祀”，^①南康府“信巫好祀”，^②建昌府“信鬼神，好淫祀”，^③临江府“俗颇尚鬼”，^④饶州府“其俗稍奢信巫鬼”。^⑤北宋真宗时期，任洪州知州的夏竦就在上朝廷的《洪州请断妖巫奏》中指出洪州一地“编民右鬼，旧俗尚巫”，他勒令“师巫一千九百余户，……改业归农，及攻针灸之脉”。^⑥洪州巫师就如此众多，巫风浓厚。而江西其他诸州亦多信巫，全境内的巫师数量可以想见是很大的。巫术作为一种宗教迷信，打着鬼神的幌子，以救治疾病、消除灾难为由，骗取了普通民众的信任，从而得以在江西社会拥有了大量的信徒。巫术在江西的盛行，使民众在心理上依赖鬼神的力量，祈求得到庇护。信众的这一祈求心理，使他们既会向巫师求神问卦，也会在寺院烧香拜佛。而且，佛教本身具有较完备的思想文化体系，是智慧与文明的结晶。而巫术则是一种迷信活动，危害社会，历来遭到有识之士的反对。两者相对比，佛教在发展上更具有潜力和优势。但不可否认，民间的“尚巫之俗”使得佛教能更容易为民众所信仰，为其传教布道打开了方便之门。

根据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必须充分适应传教地区的社会状况这一普遍规律，江西地区的信巫尚鬼神的文化特征，使江西地区的民众虔诚的信奉宗教，为宗教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当佛教传入江西后，正是借助当地民众的这种宗教心理氛围，传播流布开来。如赣州府“伉健工巧好佛信”，^⑦万载“独崇尚佛老”，^⑧广信府“丧事尚佛老”。^⑨显而易见，江西当地独有的信巫尚鬼神的地域文化特征，为民众接受佛教作了心理上的准备。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心理基础，当地民众极易接受佛教，崇拜释教。江西民风自古以来就敬奉鬼神，佛教传入以后，士庶崇信佛释，舍田建庙，蔚然成风。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即江西佛教的传播与当地民众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有江西民众具有较深的宗教信仰作前提，佛教才能较顺利的流布开来。

^①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48《风俗》

^②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48《风俗》

^③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48《风俗》

^④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48《风俗》

^⑤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48《风俗》

^⑥ (宋)夏竦《文庄集》卷15《洪州请断妖巫奏》

^⑦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48《风俗》

^⑧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48《风俗》

^⑨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48《风俗》

第4章 宋代江西佛教与社会

佛教自东传入中国后，就不断吸收儒家的思想及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加以改造与创新，以更能融入中国社会。同时，佛教又对中国社会各方面产生了诸多影响。宋代江西佛教的繁荣兴旺，既得益于当地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支持，又影响了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公益事业及民间风俗。佛教与地方社会之间相互融合，相互作用，为江西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4.1 佛教与江西地方文化教育事业

佛教本身除了蕴含丰富的理论思想外，还表现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理论体系及文化功能，逐步与中国社会文化相结合，交揉在一起。在宋代江西，江西诗派及理学的兴起，与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兴盛有很大的关系。而承载传播思想文化的书院，更是与佛教彼此融通。

4.1.1 佛教与江西诗派

南宋初，诗人吕本中创作了《江西诗社宗派图》，列黄庭坚为宗派之祖，其下列陈师道、韩驹、陈与义等25人，遂有江西诗派之名。南宋胡仔说：“吕居仁近时以始得名，自言传衣江西，尝作《宗派图》，自豫章以降，列陈师道……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①江西诗派大部分诗人是江西人，或者长期在江西游历、生活。而宋代江西是禅宗的隆盛之地，佛寺遍布全省。特别是禅宗最繁荣的黄龙与杨岐两派产生于江西境内，宗风大胜。浓厚的佛教文化氛围，深深影响江西诗派诗人的创作思想与理念。因此，“江西诗社宗派”之得名及缘起，既有佛教史之原因，又与宋代江西禅宗之兴盛有关；而这一事实又影响了宋人以禅为诗、以禅说诗的风习，从而促进了禅、诗的合流。^②正如南宋杨万里所说的那样，“要知诗客参江西，正似禅客参曹溪。不到南华与修水，于何传法更传衣。”^③曹溪南华寺为六祖慧能开创的南禅宗祖庭，江西修水是黄庭坚

^① (南宋)胡仔《落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8

^② 王祥《地域视野中的江西诗派》，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58页

^③ (宋)杨万里《送分宁主簿罗宏材秩满入京》，见《全宋诗》卷2312，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65999页

的故乡，南禅寺院众多。这首诗足以证明黄庭坚所创立的江西诗派与禅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江西诗派的诗人大多与当时著名的禅师高僧交往密切，他们的诗文创作也必然打上了禅理、禅机的烙印。如宗派之祖黄庭坚，“奉佛最谨”，^①广交晦堂祖心禅师、死心悟新禅师、灵源惟清禅师、圆通法秀禅师等，其思想上深染了禅风、禅气。其诗《议蝶图》：“蝴蝶双飞的得意，偶然毙命罗网。群蚁争收坠翼，策勋归去南柯”，抒发了一种“人生如梦”的感慨。这与禅宗所说的“梦幻空花”，一切事物都是虚幻不实的假象^②，其本质上是“空”的禅法相吻合。韩驹与大慧宗杲、灵源惟清禅师、道潜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其诗《送东林圭老游闽》：“直自三湘到七闽，无人不道竹庵名。诗如雪窦加奇峭，禅似云居更妙明。”诗中以雪窦禅师和云居禅师来比喻圭老禅师，高度赞扬了圭老禅师高超的禅诗造诣。李彭的《寄希广禅师》诗：“瘦节直疑青嶂立，道心长与白鸥闲。归来天末一回首，疑在孤峰烟靄间。”诗中描绘的希广禅师的淡泊脱俗心境，正是六祖慧能所提倡的“安闲恬静，虚荣澹泊”^③。晁冲之与佛僧密切往来，在他的《具茨集》中记载了许多与寺僧的诗文对答。他的《题超化寺壁》诗：“曲池风定碧澜平，小白鱼如镜里行。水竹再来应识我，壁间不用更题名。”表现了诗人抛弃荣华富贵，超凡脱俗，从佛受化。其他的江西诗派的诗人如谢逸“有出世之才”、“闲居多从衲子游”。^④汪革“不为世俗毫发污染，故后进之师也”。^⑤洪朋著诗说：“禅心元旨绝，世事更忘机”。^⑥这些都是说明江西诗派的诗人深受禅宗影响。

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在诗歌的创作上，更多的以佛禅为题材，形成以禅理、禅典、禅趣、禅法等入诗的禅诗。将禅义和诗论结合，把禅家的平淡意境、悠远景色、妙对锋机的方式注入诗歌创作中，改造成平淡自然、幽深清远、谐趣横生、富有理趣等艺术风格。^⑦佛禅成为“江西诗派”创作的重要源泉，江西诗人从中吸收大量的思想营养，来丰富自己的诗歌创作。随着这些禅诗的广泛流传，其中所蕴含的佛禅思想也随之而传播各个地方，教化世人。这在无形之中，自然也加速了佛教在江西各地方的传播速度和范围。

^① 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

^② (宋)普济《五灯会元》卷1，三祖僧璨坚智禅师《信心铭》：“迷生寂乱，悟无好恶。一切二边，良由斟酌。梦幻空花，何劳把捉？得失是非，一时放却。”

^③ 《坛经·附偈品》

^④ (宋)惠洪《石门文字禅》卷27

^⑤ 傅璇琮《黄庭坚与江西诗派》，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925页

^⑥ (宋)洪朋《洪龟夫集》卷下《怀黄太史》

^⑦(韩国)朴永焕《黄庭坚及江西诗派之禅诗研究》，佛学研究，2000年，第331~332页

4.1.2 佛教与理学

隋唐时期佛教心性本体论的成熟，以及它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影响，为宋明理学的产生作了理论上的铺垫。^①宋代禅宗大盛，禅宗告诫世人“心外无物”，这种“直指当下”的精神，促使了理学的产生。理学真正的创始人是周敦颐，南宋的朱熹是集理学之大成者。江西是佛教禅宗的发源地，理学大师中江西人众多，且多在江西居住、游历、讲学，与禅师大德颇有交往，“惟当时理学家浸淫禅学者实多。程门诸贤，朱子谓其后梢皆流入禅去”。^②禅宗以“佛心”为宗，直指人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心即法，法即心，对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关于这一点，蔡尚思先生精辟的论述：“佛学之影响于宋学，其时最久，而其力亦最伟。吾人谓无佛学即无宋学，决非虚诞之论。宋学之所号召曰儒学，而其所以号召者实为佛学；要言之，宋学者，儒表佛里之学而已。”^③这里就清楚的表明理学充分的吸收了佛教思想的精华，从而建立起新的思想体系。

理学开山人物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先生，曾在分宁（今修水）、南安（今大余县）、南昌、赣州等地为官。他喜佛参禅，称“佛爱亦吾爱”。广交禅僧大德，问佛于庐山归宗寺之佛印了元禅师、寿涯禅师、黄龙慧南及晦堂祖心禅师、东林寺常总禅师等，他自叹“吾此妙心，实启迪于黄龙，发明于佛印，然易理廓达，自非东林（常总）开遮拂拭，无有表里洞然”。^④刘后村诗有云：“濂溪学得自高僧”。可见，其理学思想与禅宗的因缘。佛教以莲花喻佛陀，他做著名的《爱莲说》，以示对佛教的喜爱。他的“无欲”、“主静”说渊于佛教。理学家程颢熟读佛道，“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⑤其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是“理”或“天理”，主张阴阳消长而生万物，是为天道，顺从天道即人道，其所体会为“天”。“天即理”、“天即心”，就是受到佛教三宗论、华严宗的启发。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号晦庵，婺源人，“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禅”，“初师屏山、籍溪。籍溪学于文定，又好佛老”，“（屏山）读儒书，以为与佛合。”^⑥读过大慧宗杲、沩山灵祐、永明延寿等的著作，受佛教影响甚深。认为“释氏之学，与吾儒有甚相似处。如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生，不逐四时凋”，“扑落非他物，纵横不是

^① 苏树华《中国宗教与人生修养》，齐鲁书社，2004年12月版，第341页

^② 钱穆《朱子学提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1月版，第21页

^③ 蔡尚思《朱熹的书院教育与礼教思想》，复旦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④ 苏树华《中国宗教与人生修养》，齐鲁书社，2004年12月版，第344页

^⑤ (元)脱脱《宋史》卷427《程颢传》

^⑥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104

尘。山河并大地，全露法王身”，“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①。他的“性是理，心是包含该载、敷施发用底”，“天命之谓性，要须天命个心了方是性”，^②来源于禅宗的“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地心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③陆九渊字子静，号存斋，抚州金溪人。他受禅宗的影响，认为“心即理”，“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是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主张“心”与“理”是天赋的，永恒不变的，以此来证明仁义礼智信等封建伦理道德是人心固有的，永久不变的。他的“无我”、“无物”观点，与佛教禅学“不我执”、“不他执”极为相似；“一是即是，一明即皆明”的顿悟思想，实渊自禅宗“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若识本心，即本解脱”^④的思想。

理学兴起于江西境内，理学家们与佛教高僧、禅门大德密切往来，对佛教研究甚深。他们的思想多来源于佛教，或受到了佛教的影响。理学与佛教相结合，一方面为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文化土壤，为理学的繁荣注入了新鲜、自由的活力，另一方面极大拓展了佛教的发展空间，扩大了其在学术、社会领域的影响力。两者相得益彰，共同促进了宋代江西社会文化学术思想的繁荣。

4.1.3 佛教与书院教育

书院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机构，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到了宋代，书院进入了兴盛阶段，江西更是“独领风骚”。宋代全国有 651 所书院，江西书院数目遥遥领先：其中北宋全国共有书院 92 所，江西 38 所约占 41%，居全国首位；南宋全国共有书院 365 所，江西 159 所，约占 43%；南北宋不分者，全国有 194 所，江西 23 所。^⑤著名的有南昌豫章书院、庐山白鹿洞书院、铅山鹅湖书院、信州象山书院、余干东山书院、南城吁江书院等。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叙道：“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所谓“精舍”指佛教徒潜心修行之所。从他的言论中，可以看到书院的兴起除因“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佛教的影响。完备的书院制度是在借鉴佛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仅在教育内容上深受佛教影响，而且在书院的选址、讲学风格、教育方法上，

^① (宋)朱熹《朱子语类》

^②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 5，性理 2

^③ 丁祯彦等《中国哲学名著解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 257 页

^④ 《般若品》第 2，《六祖法宝坛经》

^⑤ 苗春德《宋代教育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年 7 月第 1 版，第 107 页

都得益于佛教禅林制度。

书院的教育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佛禅的思想。两宋时期，江西涌现的大教育家有周敦颐、吕祖谦、二程、朱熹、陆九渊等，同时他们又是著名的理学家。这些大儒们本身喜佛好禅，“至以佛老为圣人”，^①与禅门高僧交往的风气颇盛，与佛教有着深厚的渊源。如明代黄绾说：“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禅。濂溪、明道、横渠、象山由于上乘；伊川、晦庵皆由于下乘。”^②关于理学家吸收佛教思想，前一节已作了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言。因此，宋儒的学术思想体系就不免深深打上了佛教的烙印。他们大都以书院为自己的学术基地，在书院著述、授徒、创立学派，他们的学术思想在书院中传播、发扬，这就自觉不自觉的把佛教思想贯穿在书院教育思想体系中。^③学子们在接受书院教育的同时，亦吸收了佛教思想。

书院的兴建，多选择在山林胜地，也是受佛教寺院多居于山水胜地的影响所致。佛教徒喜在名山胜水间建立禅林精舍，从事坐禅与讲授佛经，故“天下名山僧占多”。同时，学人士子也多寄寓古刹攻读诗书。严耕望在《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中说“唐代佛教承南北朝之盛况继续发展，臻于鼎盛，此亦助长读书山林之风尚，……寒士出身既微，惟有勤习诗赋以取进士科第，而贫无恃营山居之资，势必借寓书院静境以为习业之所。……由此言之，宋代书院制度，不但其性质由唐代士子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演进而来，即‘书院’之名称，亦由此种风尚所形成，宋人承之而大其规制，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耳。”^④受此影响，宋代江西书院的教育家们，多在远离尘世、优雅静谧的山林间创办书院，为学子们创造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如周敦颐在庐山莲花峰创立了濂溪书院，朱熹在庐山五老峰复建的白鹿洞书院，陆九渊在贵溪应天山创建的象山精舍。这些著名的书院多依山傍水，环境清幽，十分适合名儒宿师、学人士子潜思精学。以上事实说明，佛教对宋代江西书院院址的选择是有一定影响的。

书院在教育方法及学规、学范上亦模仿佛教。陆九龄认为僧侶教人“犹能分上、中、下三根”，佛教对不同的根器，有不同教法的教学态度，是值得参考的。朱熹也主张对不同年龄的人，教法、内容应有所不同。陆九龄曾有意作小学

^① (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3《奇节》

^② (明)黄绾《明道编》卷1

^③ 许吟雪《试述宋代书院文化与佛教的关系》，宗教学研究，2002年第4期，第64页

^④ 严耕望《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民主评论，5卷23期

学规，朱熹回答说：“只做禅院清规样，亦自好。”^①显而易见，在教育方法上，书院借鉴佛教主张因材施教，针对学生的特异性采取相对应的教学方法。书院的学规学范与佛教禅林的清规戒律也有相似处。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修复白鹿洞书院，亲订了白鹿洞学规。学规内容包括了纲常伦理、学问思辨、修身处事、接人待物等原则，其中的“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就是受佛教徒自身修行的准则影响。后其门人程端蒙、董铢曾撰《程董二先生学则》，与当时禅宗寺院通行的《禅苑清规》类似之处甚多。如《禅苑清规》有：“参禅问道，收摄身心，不得散乱。念经求度者，温习经书不得懒惰”的规定。在《学则》中则要求：“读书必专一。必正心肃容，以计篇数；篇数未足，而未成诵，必须成诵；篇数未足，虽已成诵，必满篇数；一书已熟，方读一书；毋务泛观，毋务强记；非圣贤之书勿读，无益之文勿观”。对比条例，两者大同小异，其中关系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所述，佛教尤其是禅宗对宋代江西书院教育的影响是很为深刻的。从教育思想、规章制度到教学管理无一不受佛教的影响，这是佛教与书院教育相互融合渗透的结果。在书院中，学人不仅从学业中汲取了佛教的思想智慧，其修身养性、做人处事也感染了佛性。佛教对于推动宋代江西书院教育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以书院作为载体，佛教以另一种传播方式迅速流传到江西各地，佛法弘传更加兴隆。

4.2 佛教与地方公益事业

中国佛教属于大乘佛教，即所谓菩萨佛教，以修行菩萨为主，发扬佛的慈悲，布施救助。佛教经文劝说僧众和信徒们从事公益事业：筑路、植树、打井、修桥、清理涉水河道等。^②正所谓“修桥辟路，佛家以为因果世之求福田利益者，所以乐为之趋。而佛家者流，所以积心竭力勤苦奉承，而不之厌也”。^③佛教僧侣深谙佛教教义，受福田思想的影响，故历来都热心于地方公益事业。及至宋代，伴随着佛教的世俗化与民众化，寺院经济的富庶，使得佛教寺院在社会上的重要性与影响力与日俱增。佛教僧侣与地方官员、士绅、社会民众的联系更加密切，他们

^① 王懋竑《朱子年谱》，浙江书局古刊本卷2第19页

^② (法国)谢和耐《中国五到10世纪的寺院经济》，法兰西远东学院丛刊，第39卷第275页

^③ (宋)文天祥《上宏修桥说》

更有能力广泛的参与到地方事物中来，对地方公益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诚然，宋代江西佛教僧侣对地方公益事业的参与不如两浙、福建两地那么广泛与深入，但亦有可述之处。在宋代江西，佛教徒经常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4.2.1 兴修桥梁

佛教福田思想之一就是“安设桥梁，过度羸弱”，兴修桥梁成为一种佛教功德，且往往由僧人主其事。因僧人具有极高的威望及化缘募斋的经验，则易于从官吏与民众那里获得钱财与人力的资助。所以，宋代江西地方桥梁的修建，其中一部分由官府委任僧人来完成。他们任劳任怨，亲自监督工程的进行，“朝夕为之督，其事颇难，其力不倦”，^①使其顺利完工。据著名宗教家方豪统计，在《古今图书集成》及各方志所记载的各类桥梁中，其中由寺院募建者，在浙江、广东占15%，在江西、江苏均占27%，而在福建居然占到桥梁总数的54%。僧人兴修桥梁，尉实可观。可见，宋代江西由佛教僧侣督建的桥梁在当地桥梁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以下列举有代表性的僧造桥梁：

抚州乐安县安浦桥，“桥几朽几修，皆以木。端平三年，秋水至桥坏。新封州守黄珪时为长议易以石”，“桥起垒石，崇三趾，层木其上，木已版至，版已辄之复以屋十”，“程督绿源寺僧日章也，靡钱縕一千五百”。^②南昌府治的程公桥，仁宗嘉祐中（1056—1063年），府守程师孟有德政，僧人所建。^③进贤县通济桥，“又名大石桥，县治东城内。宋皇祐，僧法澄法净建屋其上”。^④抚州临川县文昌桥，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毁于火。郡守薛师旦命僧妙严持簿募捐改建，“桥上建亭三，一亭备迎送，西亭为神祠，东亭为佛庐，取金鸡县东山寺废额匾之，并给予闲田、弃地，俾妙严率其徒领寺守桥，以时视察而补治之”。^⑤楼霞桥，“在州治南七十里，跨毛竹山源水路通奉新。宋时有僧募造。因桥之砥石，画夜焚香告天，忽一夕风雨，掣一巨石遂为桥柱”。^⑥抚州归德乡疏山桥，位于疏山寺之前，初置木桥，理宗景定年间（1260—1264年），“寺浮屠行谦爰创”。^⑦南

^① (宋)文天祥《上宏修桥说》

^② (清)雍正《抚州府志》卷42《艺文补·津梁》

^③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69《津梁》

^④ (明)嘉靖《进贤县志》卷2《建设》

^⑤ (清)雍正《抚州府志》卷7《津梁》

^⑥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79《津梁》

^⑦ (明)徐琼《修疏山桥记》

康府一山桥，“在府西十余里开先寺，南宋禅师佛印建”。^①洪州奉新县和丰桥，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县令王正邦重建，“董其役者为两僧人，费时约九个月”。^②抚州金溪县流源桥，“永兴寺僧行则始倡，于众相兴辇石为梁，约其桥高四寻，纵之度视高为三倍，衡视纵则十之三”。^③信州贵溪县五十三都圆通桥，“僧人善募造”。^④

4.2.2 兴修水利

为维护地方水田，促进寺院经济的发展，对于诸如修堰、筑堤等水利建设，僧人亦竭尽全力，不辞劳苦。如鄱阳中番城有澹浦湖，湖与陆地有桥、堤相连，仁宗景祐中（1034—1038）范仲淹命名为庆善桥。到南宋时期，桥堤俱圮，浮屠法照劝募民财治堤。法照卒后，惠才、德满又继续兴建终于完成。^⑤庐山诸刹例皆以石渠接引溪流灌溉寺田，有长十余里者。李纲在北宋末年曾游庐山，有诗云：“僧坊有能事，致远劳汲取，凿石为通渠，计里不计步……。沛然饮濯余，灌溉及园圃”。^⑥其中像山北之江州崇胜禅院，“而土田上腴，岁入倍之。石渠流水。二百五十余丈”。^⑦归宗禅院属南康军，为山南第一巨刹。“院东之水故名鸾溪，溪上有桥。溪西石渠流水二百丈，因水为硙，瀹圃栽蔬，规模气象皆有可观”。^⑧

4.2.3 植树造林

佛教寺院常选址于清静幽僻树木葱郁的山林之地，故僧人多在寺院旁种植杉木，一是可以美化寺院环境，二是能够致富寺院经济。庐山山南南康军有一所万杉院，是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僧太超所建。太超“即山植杉万本。有为之言于朝者，乃赐钱建院，仍锡土田佛像供器。及其成也，仁宗赐御篆其殿”。^⑨而该院亦因此于仁宗天圣中（1023—1032年）改寺额为万杉院。同属山南南康军的罗汉禅院，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00年），“祖印大师行林继之，始植松覆

^①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80《津梁》

^② (清)同治《南昌府志》卷4《津梁》

^③ (清)雍正《抚州府志》卷42《艺文补·津梁》

^④ (清)康熙《贵溪县志》卷1《津梁》

^⑤ (宋)洪适《盘洲文集》之《庆善桥记》

^⑥ (宋)李纲《梁溪集》

^⑦ (宋)陈舜俞《庐山记》卷1

^⑧ (宋)陈舜俞《庐山记》卷2

^⑨ (宋)陈舜俞《庐山记》卷2

官道十里，以建军壁。文公杨大年作栽松记”。^①兴化禅院在仁乡青龙山，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众请漳州僧以弼主持，后栽杉十万，以阅盛衰盖方事之”。^②

4.2.4 赈济医疗

佛教主旨是发扬佛的慈悲心，救济世人，造福百姓。基于此，佛教徒热衷于社会救济事业，视灾害救济、疾病治疗、贫民救助为己任，服务大众，以求功德圆满。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五月二十八日，饶州知州王秬言奉诏赈济饥民，下令“僧绍禧、行者智修煮粥，供贍五万一千三百六十五人。僧法传、行者法聚主粥，供贍三万八千五百十六人。诏僧绍禧、法传各赐紫衣，行者智修、法聚各赐度牒披剃”。^③星子县延丰寺，宋时“无极禅师纳粟赈荒”。^④又有庐山僧法坚，“亦以善医著名，久游京师，尝赐紫方袍，号广济大师，后还山。景德二年，以雍王元份久被疾，召赴阙，至则元份已薨。法坚复归山而卒”。^⑤沙门洪蕴亦以善医工诊切，“每先岁时言人生死多中，赐紫方袍，号广利大师，一时称药王再现”。^⑥饶州永宁寺用言和尚，制成一药方名为“脾积丸”，“授寺僧嘱曰其药甚效，留此为塔中灯油费耳”^⑦。道清，俗姓王，安福人，南宋孝宗淳熙间，主持重建安福戒井冈重兴律院，有医名，宁宗嘉定时赐号“慈济大师”。^⑧

宋代江西佛教僧侣对地方公益事业尽心尽力，贡献颇多。他们或自发或受官府的委托来督责公益事业，上自募钱、施财，下自召集人手，行役，既出钱又出力，僧侣们都竭尽所能。僧徒们作如此大的牺牲与贡献，除了是因为受福田思想影响外，还与其他几个因素有关：①佛教的世俗化与社会化。佛教僧侣由“出世”而“入世”，积极参与到社会公利活动中来，以此来广结善缘，修善果。②吸收佛教徒，积累寺院的财富。僧侣在地方做功德，是吸引民众皈依佛教的手段，获得信徒的尊敬与爱戴，同时也是有效的寺院致富活动。③佛教僧侣高尚的品德。无论是修桥、筑路还是水利设施的维修，都是异常艰苦的活动，非一般人可以承受。而佛教徒所具有的慈悲、坚忍的高洁品质，使他们能够忍耐

^① (宋)陈舜俞《庐山记》卷2

^② (清)同治《南昌府志》卷14《黄庭坚兴化禅院记》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道释1之36

^④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124《寺观》

^⑤ (元)脱脱《宋史》卷461《方技上》

^⑥ (清)同治《九江府志》卷41《方技》

^⑦ (清)雍正《饶州府志》卷31《仙释》

^⑧ (宋)刘辰翁《戒冈重兴院记》

操劳与辛苦，担当起重责重任。

4.3 佛教与江西地方民俗

宋代佛教深入民间社会，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使佛教逐渐世俗化、平民化，这是宋代佛教的特点。比之前代，佛教对民间社会的影响更加广泛与深入，在江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佛教的影子。佛教深深融入了当地社会，成为了普通民众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江西民俗受佛教影响，主要体现在民众日常生活中信佛奉佛，参与佛教节日，死后请僧人做道场，停柩于寺及实行火葬等方面。

4.3.1 信佛奉佛

佛教信奉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相信来世，劝诫人们只要虔诚信佛、多作善事，就能在西方极乐世界中得到再生。这对于处在两宋社会动乱时期的民众来说，具有极大的心理吸引力。人们热衷于拜佛信佛，以求得善果善报。

宋代江西民众信佛奉佛、敬诵观音的习俗，在现存的文献资料中有充分的反映。鄱阳邹氏“平昔向善，寡言语，不谈人是非，唯笃志奉佛”。^①泰和刘氏“自幼不茹荤，比长为念佛善友”。^②抚州菜园僧可楼，“庆历八年四月，得州之人高庆王明饶杰相与率民钱，为殿于其院成以佛之像置”。^③乐平“徐熙载之母程氏，酷信释书，而瞻奉观音，尤极诚敬”。^④鄱阳主使周世亨“谢役之后，奉事观世音甚谨。庆元初，发愿手写经二百卷，施人持诵”。^⑤信州盐商范信讲道“同辈孙十郎者，家世京师人。南徙信州，奉佛喜舍，日课诵观世音名万遍”。^⑥吴守道妻甘氏“好佛书尤笃”。^⑦张奭妻熊氏“不喜杀生，而居近屠坊，一闻宰戮之声，遂禁肉食终其身，其仁恤不忍之性类如此。喜诵金刚、般若经，晨起至冥，必以诵十国位课，卒岁无少懈”。^⑧吉州贺氏“嫁同乡土人江安行，有二子。自夫死不

^① (宋)洪迈《夷坚志支志》卷9《焦母大钱》

^②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140

^③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123《菜园院佛殿記》

^④ (宋)洪迈《夷坚三志辛》卷5《观音救溺》

^⑤ (宋)洪迈《夷坚甲志》卷7《周世亨写经》

^⑥ (宋)洪迈《夷坚三志壬》卷8《孙十郎放生》

^⑦ 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吴守道妻甘氏墓志铭》，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⑧ 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张奭妻熊氏墓志铭》，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页

茹葷，日诵圆觉经，释服不辍”。^①饶州民郭端友，“精意事佛”。^②

从史料来看，下层民众崇拜佛教、敬奉观音，皆得善报。如“徐熙载之母程氏虔奉观音，熙载舟行将覆，呼菩萨名得免。既归，母笑曰：‘夜梦一妇人抱汝归，果不亡’”。^③张孝纯有孙五岁不能行，有人告之曰“顷淮甸间一农夫，病腿足甚久，但日持观音名号不辍，遂感观音示现，因留四句偈曰，‘大智发于心，于心无所寻。成就一切义，无古亦无今。’农夫诵偈满百日，故病顿愈。于是孝纯遂教其孙及乳母斋洁持诵，不两月，孙步武如常儿。后患腿足者诵之皆验”。^④程节“公在娠，蓬莱母夫人梦佛授以珠，纳之怀中。既生，仁敏警有大志”。^⑤既然信佛崇佛能够消病免灾，普通大众自然会虔诚信奉，以求平安与富贵。宋代江西地区民间信佛、奉佛成风，造像抄经、诵经念佛，香火弥漫，构成了当时民间信仰习俗的重要内容。

4.3.2 停柩于寺

江西地处“楚头吴尾”，“江吴之俗，指伤寒疾为疫疠，病死气才绝，即敛而寄诸四郊，不敢时刻留”。而宋代江西民众大多选择寺庙来停放尸体待葬，原因有三：一是认为寺庙的神灵能够庇佑亡灵；二是能够方便僧人做道场及法事；三是可以起到防止疾病流传的作用。所以，江西各地就有了在人死后，停柩于寺以待下葬的风俗。如“临川民张圭死，置柩于城西广泽庵。…又鄱阳亦有小民，以六月拜岳祠，触热闷绝，亟柩于厝普通塔，其事同”。^⑥“乡人朱汉臣，宣和中为太学官。其乳母死，殡于僧庵”“庵中陬柩不少”。^⑦饶州“芝山在城北一里，前后左右皆墓域，僧寺两庑，诹柩相望”。^⑧“户部员外郎阮阅，江州人。宣和末，为郴州守。子妇以病卒。权殡于天宁寺”。^⑨“户部郎中彭合，吉州庐陵人，知赣之信丰县。……公将出郊劝农前一夕，梦妇人来诉曰‘妾侨寄水东寺中’明日至寺，询之，则某家妇旅殡久矣，趣其家葬之”。^⑩江西民众死后停柩于寺的习俗，是佛教传入后对江西民俗影响而产生的一个重要变化。

^① (宋)洪迈《夷坚甲志》卷10《贺氏释政》

^② (宋)洪迈《夷坚丙志》卷13《郭端友》

^③ (清)赵翼《陔余丛考》卷34《观音像》引

^④ (宋)洪迈《夷坚甲志》卷1《观音偈》

^⑤ 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宝文阁待制程节君墓志铭》，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

^⑥ (宋)洪迈《夷坚丁志》卷15《张珪复生》

^⑦ (宋)洪迈《夷坚丙志》卷11《朱氏乳媪》

^⑧ (宋)洪迈《夷坚丙志》卷11《芝山鬼》

^⑨ (宋)洪迈《夷坚丙志》卷15《阮郴州妇》

^⑩ 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户部郎中彭合行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

4.3.3 丧葬习俗

佛教东传，给民间的丧葬习俗添加了不少新的内容和形式，有些本为佛家所有的丧葬仪式自然也更直接影响了民间丧俗。^①随着宋代江西佛教的广泛传播，民间丧葬习俗因此产生了新了变化。做功德是佛教影响民间丧葬习俗的一个方面。佛教宣扬天堂地狱之说，“做道场功德，则灭罪升天，否则入地狱，受锉烧舂磨之苦”。^②所以，民间遇丧事，请僧徒做道场，或水陆大会，写经造像，修建塔庙，以尽孝心。如通直郎张潜，“二讳每临，必前期疏蔬，为佛事。……又即故居之北资福院，建轮藏，以奉皇妣。工既告毕，遂径诣庐山，饭僧凡数千人；其孝思不匮类如此”。^③鄱阳坊俗“每岁设禳灾道场，不常厥处。庆元四年四月，复就永宁寺大殿，于第四夜命僧建水陆斋供，加持斛盘”。^④俞文豹的《吹剑录外集》记载：临川黄谔，安葬其父，决定不用僧道，立即遭到“亲族内外群起而排之”，于是采取了“半今半古”之礼。这个例子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在丧葬礼俗中深深融入了佛教因素，安葬用僧道作功德已成为丧葬习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影响丧葬习俗的另一表现为火葬。佛教未传入中原地区前，葬法以土葬为主。“自释氏火化之说起，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⑤随着佛教东传，火葬渐流行开来。到唐末五代，社会战乱不休，人们朝不保夕，儒家传统的“死必归土”的观念动摇，火葬蔚然成风。“火葬之俗，盛行于江南，自宋时已有之”，^⑥江西地属江南，民俗受佛教的影响，亦实行火葬。“江吴之俗，指伤寒为疫疬，病死气才绝，即殓而寄诸四郊，不敢时刻留。……至秋，将火葬”。^⑦洪迈的《夷坚志》记载：有名为赵缩手者，死后“以香火致敬，越三日火化，其骨钩联如锁子云”。^⑧据《宋史》记载，南宋川、江、浙、闽、湘、赣地，火葬成习，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在促使火葬风俗形成的过程中，佛教僧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地僧寺一面积极宣传火化，另一面为世俗百姓办起火葬场，当时称为“化人亭”，一般位于寺庙附近。这方面的例子多见于两浙地区，如苏州的火葬场即化人亭在

^① 梁晓红《民间丧俗看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宁波师院学报，1991年第4期，第60页

^② (宋)俞文豹《吹剑录全编·四录》

^③ 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通直郎张潜行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页

^④ (宋)洪迈《夷坚三志辛》卷2《鬼迎斛盘》

^⑤ (宋)洪迈《容斋续笔》卷13《民俗火葬》

^⑥ (明)顾炎武《日知录》卷15《火葬》

^⑦ (宋)洪迈《夷坚丁志》卷15《张珪复生》

^⑧ (宋)洪迈《夷坚丙志》卷2《赵缩手》

城外西南隅的通济寺和齐升院，其习俗为“亲死肉未寒，即举而付之烈焰”。^①江西与两浙同属江南，地理位置上亦紧邻，在丧葬习俗上亦有相似之处。关于宋代江西地区实行火葬的文献资料并不多见，所以不能断定火葬在江西社会丧葬中的地位。但佛教在江西广泛传播，改变了原有的旧的丧葬习俗，促使火葬在这一地区流行，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4.3.4 节日习俗

江西佛教的流行，给当地的民间节日增添了许多宗教因素。江西民众信佛拜佛，乐于到寺庙参加这些宗教性节日。一来可以拜佛烧香，祈福消灾。二来因寺院多位于环境优美的名山大川，可以游玩娱乐。融入了佛教元素的宗教性节日颇多，最重要的佛教节日是浴佛节。俗称四月八日为佛祖释迦摩尼的生日，被称为“佛日”。各寺院都建与佛斋会，僧徒用小盒装铜像，放入有香药糖水（浴佛水），一面铙钹交迎，遍走街巷闾里，一面用小勺浇灌佛像，浴佛传教。江西民间积极参与这一活动，如九江一地“四月八日观雨暘，以占水旱。浮屠浴佛，人家施乌饭”。^②浮梁县的民众“造清饭馈遗浮屠，浴佛遍步里巷”。^③“佛教”五戒”第一条就是“不杀生”，同时还提倡“放生”。受其影响，民间还举办放生会。如广昌县莲花庵，僧人诵经，“邑人于此放生”。^④新昌县净戒寺，“庆历六年，知县建放生亭”，^⑤以供佛教信徒们进行放生活动。其他佛教节日还有花朝节、盂兰盆节等。花朝节时，僧寺和尼庵建释迦涅槃会，信徒前往烧香。盂兰盆节时，僧寺建盂兰盆会，向施主募捐钱米，代荐亡人。是日，百姓一般不吃荤，屠户为之罢市。综观江西节日的信仰性活动，可以发现，是深受佛教影响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佛教对宋代江西地方民俗的影响是很深刻的。佛教的制度、仪式和佛事活动，极大的丰富了江西的民间节俗，而且已经渗透到民间的各阶层，可谓深入而广泛。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佛教的传播为传统的民俗输入了新鲜的内容，另一方面是佛教文化与汉族文化有些内容是本质相同的，比如“孝道”、“慈悲”等等，因而两者可以融会贯通。江西地方民俗出现的这些新的变化，实际上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结果。

^① (明)黄震《黄氏日钞》卷70

^② (清)同治《九江府志》卷8《风俗》

^③ (清)康熙《浮梁县志》卷1《风俗》

^④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124《寺观》

^⑤ (清)光绪《江西通志》卷122《寺观》

第5章 结语

有宋一代，在江西这块沃土上，云门、法眼、黄龙、杨岐诸宗派崛起，临济、曹洞宗远播海外。高僧大德，多古尊宿，佛寺遽增，遍布州县。佛教流传之广，遍及全境。这些都共创了宋代江西佛教的辉煌，并为宋以后佛教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其能够持续良性的发展。

宋代江西佛教的发展受益于一个稳定的历史环境。宋代自建国始就确立了扶持佛教的政策，两宋诸帝虽在政策的执行上有所轻重，但不可否认，他们都重视佛教的辅国功能，因而无一例外地崇佛。佛教得到了当朝统治者的认可，遂有机会向下流布开来。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江西的地方官吏崇佛从风。他们或请名僧禅师主持寺观，开坛讲法，或捐钱献物，兴建佛寺，为佛教在江西的发展增添了政治助力。同时，他们对佛教的尊崇，还加深了豪门大族、乡绅邑人、平民百姓对佛教的信仰。正是有了社会上这几股力量的支持，佛教才能够在江西站稳脚跟，并向纵深发展。此外，宋代江西繁荣的经济也是佛教发展的重要条件。众所周知，宋代江西不论在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上都盛极一时，诸多郡县经济雄厚。经济富庶，士庶修庙造像，刊刻佛经，就有了物质基础。加之，江西历来所具有的尚巫好鬼的地域文化，也为佛教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宗教环境。

佛教因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在江西繁荣兴盛，反过来，佛教的发展又对地方的文化教育、公益事业、社会民俗等产生诸多影响。“江西诗派”的创作、理学的兴起、书院的繁荣，都与佛教有着极深的渊源。佛教僧侣对地方事业也贡献颇多，主要表现在建桥修路、兴修水利、植树造林、赈济医疗等方面，促进了地方的建设与发展。佛家僧侣的这些公益活动，为他们赢得了威望与尊重，亦吸收了大量的佛教信徒，这就扩大了佛教信徒的社会基础。佛教信仰与习俗，遂成为宋代江西普通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江西佛教已经渗透到了社会各阶层，佛教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所接受。佛教在江西社会中发挥了相应的社会功能，促进了社会思想文化教育的繁荣，加快了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使社会民俗中融入了佛教的因素。这一切都昭示着佛教弥补了国家与地方官府社会事务上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所以，佛教对于宋代江西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

致谢

经过一年的思考与写作，我的硕士论文《宋代江西佛教与社会》终于完成。在此，由衷的感谢我的导师宋三平教授。本课题在选题及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导师宋三平教授的悉心指导，两年半来，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深深的感染与鼓励着我。在论文初稿出来之后，老师对我的论文进行了悉心的指导，从论文的内容、字词到论文的标点、格式，均提出了精确而严密的修改建议，使我的论文更加完善。由于本人学识有限，论文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但我一定牢记老师的教诲，继续作刻苦的钻研。

回首两年半的研究生学习，不论是从做人，还是做学问，我都收获颇多。我的导师宋三平，不仅在学业上助我成长，还教我如何做人、做事，谨此对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同时还应感谢历史系的袁礼华教授、周兆望教授、吴小卫教授、顾兴斌教授，你们渊博的学识与诚恳的学风，令我受益非浅。

在准备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我得到了众多师友的襄助与鼓励。上一届的师兄李坚、师姐崔丽君，为我的论文写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及方法上的指导，对他们表示特别的感谢。我的同门刘文杰，在两年半的学习中我们互相帮助，共同努力进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外，还应感谢我的同学刘菲菲、周莲香、罗欣等，给予我莫大的帮助。

巩丽君
2007年11月1日

参考文献

主要参考古籍：

- [1] (元) 脱脱:《宋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年版
- [2] (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年版
- [3] (清) 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年版
- [4] (元) 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年版
- [5] (宋) 佚名:《宋大诏令集》,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版
- [6] (宋) 钱若水:《太宗实录》,四部丛刊本
- [7] (梁) 释慧皎:《高僧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92年版
- [8] (宋) 普济:《五灯会元》,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版
- [9] (宋) 晓莹:《罗湖野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0] (宋) 惠洪:《石门文字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1] (宋) 志磐:《佛祖统记》,《大正藏》本
- [12] (元)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3] (宋) 李觏:《李觏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 [14] (宋) 陆游:《渭南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5] (宋) 朱熹:《朱文公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6] (宋) 江休复:《杂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7] (宋) 吴潜:《许国公奏议》,中华书局点校本
- [18] (宋) 曾巩:《曾巩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
- [19] (宋) 苏辙:《栾城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0] (宋) 洪迈:《容斋四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1] (宋) 曾巩:《元丰类稿》,《四部丛刊》本
- [22] (宋) 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79年版
- [23] (宋) 周煇:《清波杂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
- [24] (宋) 王谠:《唐语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5] (宋) 王闢之:《渑水燕谈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6] (宋) 洪适:《盘洲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7] (宋) 李纲:《梁溪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8] (明) 黄绾:《明道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9] (明) 嘉靖四十二年刊本《进贤县志》
- [30] (清) 光绪七年刊本《江西通志》
- [31] (清) 同治十三年刊本《九江府志》
- [32] (清) 同治十三年刊本《广昌县志》
- [33] (清) 雍正七年刊本《抚州府志》

- [34] (清) 同治十二年刊本《赣州府志》
- [35] (清) 同治十二年刊本《南昌府志》
- [36] (清) 康熙二十二年刊本《贵溪县志》
- [37] (清) 道光四年甲申刊本《石城县志》

主要参考著作：

- [1]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85年第1版
- [2] 印顺：《中国禅宗史》，江西人民出版社重印本，1990年版
- [3] 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
- [4] 顾吉辰：《宋代佛教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 [5] 郭朋：《宋元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6] 魏道儒：《宋代禅宗文化》，郑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 [7] 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
- [8] 黄启江：《北宋佛教史论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4月版
- [9] 蒋义赋：《宋儒与佛教》，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6月版
- [10] 许怀林：《江西史稿》，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1月版
- [11] 韩溥：《江西佛教史》，北京光明日报社，1995年版
- [12] 苏树华：《洪州禅》，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7月版
- [13] 姚瀛艇主编：《宋代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
- [14] 林富士主编：《礼俗与宗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4月版
- [15] 朱瑞熙等：《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
- [16] 徐杰舜主编：《汉族风俗史—隋唐·五代宋元汉族风俗》，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 [17] 张践：《中国宋辽金夏宗教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18] 张十庆：《五山十刹图与南宋江南禅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 [19] 姚南强：《禅与唐宋作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20] 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版
- [21] (美) 韩森著 包伟民译：《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22] (美) 太史文著 侯旭东译：《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23] 何明栋主编：《江西省宗教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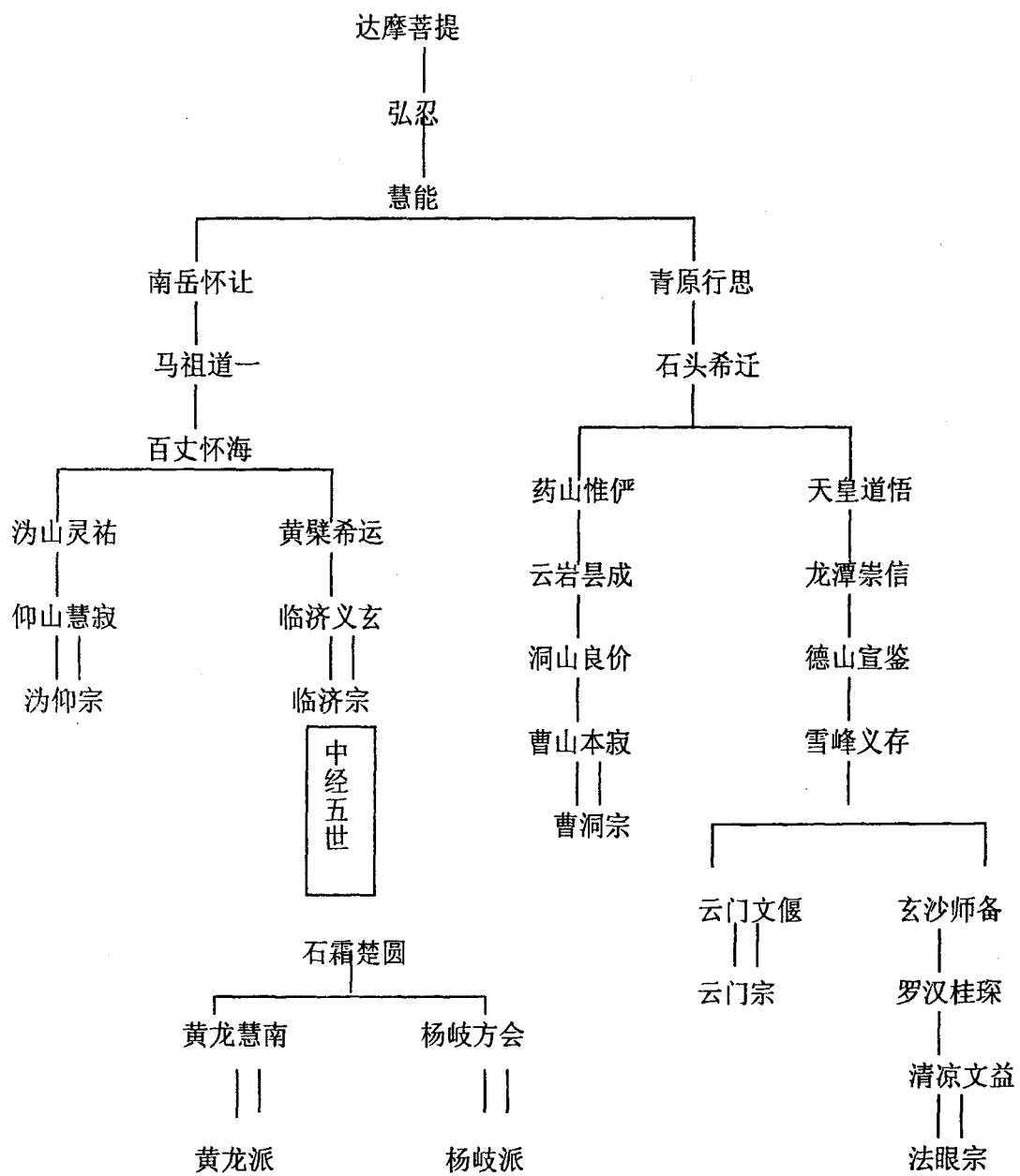
主要参考论文

- [1] 童辰. 江西古代佛教文化概说. 江西社会科学, 1996, (4): 37~41
- [2] 许怀林. 十世纪前佛教在江西的传播. 江西师院学报, 1983, (4): 28~36
- [3] 郑群辉. 论宋代诗僧创作的杰出成就.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6, 27(1): 26~32
- [4] 王祥. 地域视野中的江西诗派.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28(3): 56~59
- [5] (韩国) 朴永焕. 黄庭坚及江西诗派之禅诗研究. 佛学研究, 2000, 310~334
- [6] 高建立. 从心性论看朱熹对佛学思想的吸收与融会. 齐鲁学刊, 2007, (3): 28~32

参考文献

- [7] 张立文. 佛教与宋明理学的和合人文精神. 世界宗教研究, 1996, (2): 2~6
- [8] 童辰. 理学与中国佛教.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1995, (2): 53~57
- [9] 郭朋. 佛教禅宗与程朱理学. 中国佛学论文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4: 109~149
- [10] 宋道发. 周敦颐的佛教因缘. 法音, 2000, (3): 29~34
- [11] 程民生. 论宋代佛教的地域差异. 世界宗教研究, 1997, (1): 39~47
- [12] 宁静, 唐江. 近十年江西佛、道教研究现状述略. 江西社会科学, 1995, (10): 123~124
- [13] 游彪. 论宋代寺院经济的地域差异.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0, (3): 30~38
- [14] 孙家驹. 开宗创派的江西佛教丛林. 南方文物, 2001, (2): 88~89
- [15] 吕凤棠. 宋代民间的佛教信仰活动. 浙江学刊, 2002, (2): 145~152
- [16] 伍德勤. 佛教与中国古代教育. 阜阳师院学报, 1993, (4): 115~120
- [17] 何明栋. 佛教对我国古代书院的影响. 朱子学刊, 1992, (4): 9~15
- [18] 许吟雪. 试述宋代书院文化与佛教的关系. 宗教学研究, 2000, (4): 63~67
- [19] 范荧. 宋代民间信仰中的佛教因素.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1995, (1): 72~78
- [20] 刘清荣. 宋代江西农业的进步及原因分析. 江西社会科学, 2006, (2): 239~244
- [21] 许怀林. 试论宋代江西经济文化的大发展. 宋史研究论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641~674
- [22] 宋三平. 宋代的坟庵与封建家族.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5, (1): 40~47
- [23] 张伟. 宋初佛教政策与佛教的复兴. 浙江师大学报, 1998, (3): 81~84
- [24] 李小红. 宋代尚巫之风及其危害. 史学月刊, 2002, (10): 96~100
- [25] 梁晓红. 从民间丧俗看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宁波师院学报, 1991, 13 (2): 60~64

附录 A 禅宗五家七宗表



资料来源：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第3页

附录 B 宋代江西佛寺兴建表

序	寺院名称	建寺时间	地点	建寺人
1	禅隐寺	淳化间	南昌县	
2	普照寺	淳祐间	南昌县	
3	永和庵	宋	永和门外	敕赐
4	谨严院	度宗元年	新建县	敕建
5	智度院	宋	丰城县	僧广照
6	宝莲院	嘉定间	奉新县	富溪刘氏
7	报身院	宋	靖安县	
8	金峰院	宋	高安县	大理丞刘襄迁居
9	净慈院	宋	高安县	刘涣故里
10	慧庆寺	咸淳间	新昌县	姚德卿施地建
11	宝云寺	宋	新昌县	僧觉范静室
12	净戒寺	庆元六年	新昌县	知县
13	昙华寺	乾道五年	萍乡县	
14	治平院	乾道间	萍乡县	
15	胜果院	开宝四年	万载县	僧东严
16	保安院	开宝二年	万载县	僧介庵
17	安德院	开宝四年	万载县	僧惟宝
18	净信院	开宝四年	万载县	僧介庵
19	净觉院	太宗	万载县	法顺禅师开基
20	慧力寺	熙宁间	临江府	
21	驿马寺	淳熙间	新喻县	僧白立庵通驿路
22	西华寺	宋	新喻县	
23	益州寺	宣和间	吉安府	
24	明心院	开宝三年	卢陵县	僧至明
25	地藏寺	绍圣间	泰和县	
26	殊山寺	绍兴间	泰和县	
27	慧隆院	治平三年	泰和县	
28	隆福院	治平间	泰和县	
29	宝积寺	靖康间	吉水县	
30	济渡庵	景祐间	吉水县	驸马都尉张冥淑
31	保安院	宋	安福县	僧
32	宝珠院	宋	安福县	僧义
33	法济院	祥符间	龙泉县	僧妙有开基
34	海智寺	至和间	万安县	
35	定明寺	绍兴年	万安县	
36	清泉寺	嘉定间	万安县	
37	智胜寺	嘉定时	万安县	敕建
38	南台寺	嘉定时	万安县	
39	三惠寺	嘉定时	万安县	
40	东山寺	太平兴国	永新县	

附录 B 宋代江西佛寺兴建表

续表

41	游抚寺	绍兴二年	永宁县	僧志远
42	彰圣寺	宋	永宁县	
43	大益寺	淳祐间	永宁县	僧碧潭开基
44	曲观寺	政和元年	永宁县	僧怀间
45	莲花院	绍兴间	永宁县	
46	后山寺	皇祐间	崇仁县	
47	东林寺	宋	崇仁县	
48	清溪寺	宋	崇仁县	
49	观性寺	乾德五年	乐安县	
50	龙回寺	太平兴国八年	乐安县	
51	禄源寺	北宋	乐安县	
52	寿昌寺	咸淳间	南丰县	里人张友开兴复
53	祥光寺	绍兴二年	南丰县	
54	灵山寺	建隆元年	新城县	
55	香山寺	建隆三年	新城县	
56	觉慈寺	开宝三年	新城县	
57	广照寺	皇祐间	新城县	僧西竺
58	泽心寺	宋	泸溪县	
59	安定寺	绍兴二年	泸溪县	参军石松
60	景德寺	景德间	上饶县	
61	祥符寺	大中祥符年间	上饶县	
62	荐福寺	建炎间	上饶县	
63	普安寺	绍兴间	上饶县	
64	高泉报恩院	嘉祐中	上饶县	
65	瑞丰院	咸平中	玉山县	
66	等慈院	天圣中	玉山县	
67	天井院	宋	玉山县	
68	石僧院	绍兴间	玉山县	
69	北山寺	宣和间	弋阳县	周氏舍宅建
70	白石寺	元祐间	弋阳县	
71	开宝寺	嘉定中	弋阳县	
72	清泉寺	宋	弋阳县	
73	鸣山寺	景平间	贵溪县	
74	仙岩寺	熙宁间	贵溪县	
75	悟空庵	治平二年	铅山县	
76	景福寺	绍兴年间	广丰县	
77	龙洋寺	淳熙间	广丰县	
78	明心寺	淳熙间	广丰县	
79	鹿苑寺	元符中	广丰县	
80	龙山寺	开宝间	兴安县	
81	龙兴宝信寺	元丰间	兴安县	

附录 B 宋代江西佛寺兴建表

续表

82	弋湖寺	宝祐间	兴安县	
83	浮梁寺	治平二年	鄱阳县	
84	地藏寺	开宝四年	鄱阳县	
85	宝胜寺	元祐中	乐平县	
86	教忠寺	乾道元年	乐平县	
87	本教寺	咸淳间	乐平县	
88	阳府寺	绍兴十年	浮梁县	僧绍溪
89	万寿寺	宋	浮梁县	
90	祝圣寺	政和元年	浮梁县	僧如建
91	雾山寺	祥符间	德兴县	
92	东泉寺	建炎四年	德兴县	僧穆庵
93	天王寺	天圣二年	安仁县	
94	吉泉寺	咸淳元年	安仁县	僧东云
95	慧禅寺	咸平二年	安仁县	僧海印
96	水陆寺	建炎间	安仁县	僧远天开基
97	香城寺	宋	安仁县	
98	莲花寺	咸平二年	安仁县	僧节堂
99	盖竹寺	咸平二年	安仁县	僧若无
100	白塔寺	咸淳中	安仁县	绍澄建
101	玉石教院	咸平中	安仁县	僧成师
102	能仁罗汉寺	咸平中	星子县	广济坚禅师
103	都率院	崇宁四年	星子县	僧法克
104	大成寺	乾道间	星子县	僧云峰
105	屏风寺	淳熙间	星子县	僧太虚
106	万寿寺	宋	星子县	僧法缘
107	太平寺	宋	星子县	僧高峰
108	石佛寺	宋	星子县	僧度林
109	华严寺	宋	星子县	僧规圆
110	迴风寺	宋	星子县	僧慧益
111	慧日寺	宋	星子县	僧如义
112	观音庵	宋	星子县	僧智超
113	泗洲寺	治平间	建昌县	僧宗道
114	龙溪寺	熙宁中	建昌县	僧存节
115	崇福寺	淳熙中	建昌县	雁门陈禅师
116	布水寺	庆元间	建昌县	僧衍初
117	南源寺	宋	安义县	杨可逸可遵兄弟
118	舍利寺	建炎二年	德化县	太一禅师
119	天池寺	嘉定间	德化县	
120	布金寺	建隆初	德安县	僧善宽
121	东山寺	嘉泰间	瑞昌县	
122	四峰寺	元祐间	瑞昌县	

附录 B 宋代江西佛寺兴建表

续表

123	净明寺	淳熙间	瑞昌县	
124	南禅寺	庆历五年	瑞昌县	
125	乌竹寺	庆历间	瑞昌县	
126	双泉寺	庆历间	瑞昌县	
127	下钟山寺	嘉祐中	湖口县	僧佛印
128	吉祥寺	治平四年	湖口县	
129	崇梵院	隆兴间	彭泽县	
130	鹫峰寺	淳化元年	彭泽县	
131	宝界寺	皇祐初	大庾县	
132	报恩寺	崇宁间	府城东	
133	寿昌寺	皇祐间	大庾县	
134	宝积寺	咸平间	大庾县	
135	法华院	宋咸淳间	南安府	
136	法寂院	天禧间	南安府	
137	大中祥符寺	北宋	南康县	
138	龙归寺	宋	上犹县	
139	金仙寺	宋	崇义县	
140	合龙山寺	宋仁宗	赣县	
141	万法寺	宋淳熙九年	赣县	
142	化城寺	宋	赣县	
143	法龙庵	宋	赣县	
144	金文寺	太平兴国七年	信丰县	邑人刘仁举
145	长寿寺	治平二年	信丰县	
146	东禅寺	元丰二年	信丰县	
147	南禅寺	宣和中	会昌县	
148	海印寺	祥符九年	安远县	
149	慈光寺	治平初	安远县	
150	祖印寺	崇宁二年	安远县	
151	净业寺	崇宁二年	安远县	
152	方广寺	绍兴四年	安远县	
153	广法寺	绍兴十一年	安远县	
154	东林寺	乾道四年	安远县	
155	西山寺	绍兴间	龙南县	
156	神仙庵	宋	定南厅	
157	南塔寺	宋	瑞金县	
158	永福寺	大中祥符五年	石城县	僧月峰
159	海藏寺	元丰间	石城县	
160	内宫禅院	大中祥符八年	石城县	僧派清
161	宝福院	大中祥符年间	石城县	

资料来源：清光绪《江西通志》卷 121—125 《寺观》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已发表论文

[1] 巩丽君:《宋代社会风俗》,《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增刊,2007(38):103~104